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臺灣民粹主義態度探源：選舉輸家的解釋

Loser's Populism:

the Origin of Taiwanese Populist Attitude

林懿平

Yi-Ping Lin

指導教授：張佑宗 博士

Advisors: Yu-Tzu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July 202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臺灣民粹主義態度探源：選舉輸家的解釋
**Loser's Populism: The Origin of Taiwanese Populist
Attitude**

本論文係 林懿平 君（學號：R09322017）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若宇

（簽名）

（指導教授）

劉嘉敏

陳陸輝

謝辭



這篇論文從醞釀發想到付諸實踐的總期間，差不多就跨度了我整個碩士生生涯，從尚未入學時的期末報告發想，到歷經兩次臺灣政治學會年會的磨練，最終用上課程的所學凝聚成文，將其視為我碩士所學的濃縮並不為過。

這一路上首先要感謝的人是指導老師張佑宗教授，在我大四仍對未來充滿迷茫的時候開啟了我對比較政治領域以及民粹主義此一主題的興趣，並傾力協助我持續將我的研究問題發展成熟。再來我要感謝陳家洋學長提供給我極好的研究範例供我依循，讓我不用從頭開始建構，能夠在研究的起點就有非常明確的方向。我另額外要感謝煥凱學長，不厭其煩的教導我統計學習的技術面，讓我的論文能在方法上獲得突破。最後我想感謝陸輝老師與嘉薇老師，從兩次臺政會擔任我的評論人到成為我的口試委員，期間所給我的所有指教。

除了論文本身的指導，學術研究本是一條非常孤獨的路，自學也是極其枯燥乏味的過程，因此我非常感激我在這條路上並不孤單，所以我要在這裡特別感謝良亦與易修，兩位在學識、技術與各方面經驗都遠超於我的人願意不藏私的與我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與構想，除去課堂學習，在與他們互動的過程絕對是我人生中學習到最多的時刻，同時也要感謝他們與研究室的大家都並不過於嚴肅，能夠讓我的碩士班生涯充滿樂趣。雖然將來大家很可能踏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還是希望這個情誼可以不要就此消失，我也由衷祝福他們能鵬程萬里。

最後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在我決定要繼續深造時提供給我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並相信我的判斷與人生選擇，沒有他們的幫助與信任，我的碩士路一定會極其艱辛，甚至根本窒礙難行。

中文摘要

國立臺灣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臺灣民粹主義態度探源：選舉輸家的解釋

所組別：政治學系（學號：R09322017） 論文頁數：69 頁

研究生：林懿平 指導教授：張佑宗 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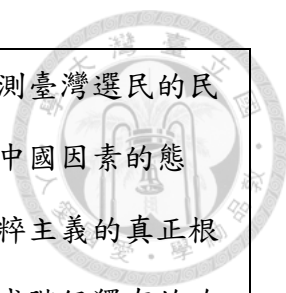
關鍵字：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態度、選舉輸家、變數篩選、機器學習

論文提要內容：

在政治學界大量轉向關於 COVID-19 政經後果的研究之前，在歐洲興起的極右派民粹主義(Populism)風潮曾經被視為近年最大的「自由民主危機」。這股潮流不僅從舊世界吹向新世界，使川普(Donald Trump)爆冷當選美國總統，更在亞洲延燒：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的 BJP 擊敗甘地家族、菲律賓出現政治「局外人」杜特蒂(Rodrigo R. Duterte)出任總統，臺灣也在 2017 年吹起「韓流」。

從川普到韓國瑜，民粹主義的特性一直是製造出「非典型」的選舉結果，這自然激起了政治學界的研究興趣。選民為何會出現民粹主義態度、悖離既有政治分歧(Political Cleavage)並轉而支持這些非典型候選人，自是此研究旨趣中最重要的研究問題之一。

本研究以臺灣民主鞏固以來兩波最大的民粹主義現象為研究對象，結合當代比較民粹主義研究之理論及方法，依據民粹主義「供需理論」的架構，分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的第四波與第五波臺灣調查資料，並透過以機器學習為基礎的變數篩選方法，來進行各種民粹主義態度解釋顯著性的比較，進而達成理論辯證的結果。



本文發現，身為上一次總統大選中的選舉輸家，更能夠預測臺灣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生成。相較於經濟衰退、文化變遷造成的焦慮或對中國因素的態度，政治制度安排所造成的「贏家全拿」效果或許才是臺灣民粹主義的真正根源。這個發現意味著，民粹主義在臺灣並非是特定政黨、族群或階級獨有的政治態度，也不會因為特定政黨落敗就消聲匿跡。

ABSTRACT

LOSER'S POPULISML

THE ORIGIN OF TAIWANSES POPULIST ATTITUDE

by

Yi-Ping Lin

July 2022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COMPARATIVE POLITICS

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S: Populism, Populist Attitude, Electoral Loser, Variable Selection, Machine Learning

Before academia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OVID-19, the rising far-right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was considered the worst crisis of the modern liberal democratic order. In terms of scale, populism also spread across contexts, including the "Han Kuo-Yu phenomenon" in Taiwan.

From Trump to Han Kuo-Yu, populism has shown its defining trait of creating atypical electoral results. Electorates affected by populism abandon their political cleavage in support of populist candidates. This puzzling phenomenon begs the question of why electorates support populism. In other words, why and how did populist attitudes occur among the electorates.

Combining existing theories and contemporary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on populism, this research takes on two cases of the populist movement in post-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aiwan. To find out why Taiwanese electorates developed a populist attitude, a machine-learning variable

selection process is performed on 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database.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contrary to commonly recognized reasons for populist support, being electoral losers in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the best predictor of populist attitude among the Taiwanese voters. This result indicat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electoral system could be the primary stimuli for populist attitudes. It also means populism in Taiwan is not bound to particular demographic features or partisanship. This discovery is innovative not only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for it creates a new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for future comparative research.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2
第三節 章節安排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
第一節 民粹主義及其解釋	5
第二節 民粹主義在臺灣	11
第三章 理論與研究設計	23
第一節 理論建構	23
第二節 研究設計	25
第四章 敘述統計與交叉分析	35
第一節 敘述統計	35

第二節 交叉分析.....	39
第五章 正規化迴歸分析與研究結果.....	43
第一節 理論競逐.....	43
第二節 模型建構與共線性檢測.....	46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51
第一節 輸家的民主.....	51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方向.....	53
參考文獻.....	55
附錄一.....	65
附錄二.....	67
附錄三.....	69



圖目次



圖 3-1 直接相合法的因果結構.....	31
圖 3-2 條件式判定法的因果結構	31
圖 5-1 針對第四波調查的正規化迴歸結果	44
圖 5-2 針對第五波調查的正規化迴歸結果	45

表目次



表 2-1 人民他者在四個民粹主義現象中的意義演變.....	16
表 4-1 第四波與第五波選民民粹主義態度比例.....	35
表 4-2 第四波與第五波調查自變數與控制變數之分佈.....	37
表 4-3 第四波調查自變數、控制變數與民粹主義態度之交叉分析.....	39
表 4-4 第四波調查自變數、控制變數與民粹主義態度之交叉分析.....	40
表 5-1 第四波與第五波未控制模型.....	46
表 5-2 第四波與第五波控制後模型.....	47
表 5-3 各模型之 VIF.....	49

方程式目次



式 1 LASSO 方程式.....	27
式 2 Ridge 方程式.....	27
式 3 Elastic Net 方程式.....	27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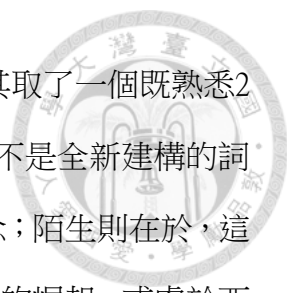
本文嘗試從選舉輸家的新角度解釋臺灣民粹主義態度之起源，本章作為全文起始將分為三個小節，分別為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章節安排，其內容涵蓋本文的問題意識與解答問題之切入點。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冷戰結束與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自由民主秩序（Liberal Democratic Order）一直被視作理想的國內、國際政治秩序建構典範，民主自由被絕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奉為圭臬，而威權、極權與壓迫則被看成是20世紀不堪回首的歷史，世界僅存的非民主國家不是正在主動緩步改革、就是受到極大的國際輿論壓力而被動改革（Fukuyama, 2006）。

然而，這股樂觀卻在近年逐漸消亡，隨著金融危機與各種社會結構的矛盾湧現，各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支持似乎正在減退：一方面，在自由民主秩序的邊陲，從土耳其的艾爾多安（Erdogan）到波蘭法律與正義黨（PIS）的執政（Stanley & Cz., 2019: 67-87），多元主義與憲政民主正在衰退；另一方面，在自由民主秩序的核心，政治競爭也越趨兩極，難以回歸理性辯論，出現脫歐、川普支持者攻佔國會山莊等過去無法想像的政治危機（USA Today, 2021）。

與過往的「中國模式」（Dirlik, 2012）的擴散或「銳實力」的穿透（Walker, 2018）不同，這些政治危機乃是內生於自由民主秩序體制之內，更重要的是，它多半也強調某種民主價值，不分政府體制與文化脈絡地號召「純真的人民」打倒「腐敗菁英」，甚至強調自己所倚仗的這些概念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面對這些危機，民主國家的政治菁英既無法訴諸到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對峙來對抗，也無法直接就這些威脅的主張本身做徹底的批判（Kaltwasser, 2012）。針對這種生於自由民主秩序又




反對自由民主秩序價值信仰的新威脅，各國的媒體界與學界為其取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民粹主義（Populism）。熟悉在於，民粹主義並不是全新建構的詞彙，而是一直存在於西方媒體與政治學研究語境之中的模糊概念；陌生則在於，這個詞彙的時空錯置，它本該存在於歷史裡，用來解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或處於西方民主國家的疆域之外，用來描述近代拉丁美洲失靈失能的民主。

這種時空錯置的特色激起了世界各地研究者的興趣，加上它作為一種自由民主秩序潛在崩潰因素的內生性質，讓許多學者認為，若要理解乃至解決當代自由民主秩序退潮的根本原因，民粹主義產生的「謎團」必須被解開（Mudde, 2018）。但民粹主義現象作為一個政治現象，其與社會各界的關係可謂錯綜複雜，學界意識到相關研究必須專注在特定的主題之上，而若要緊扣前述的自由民主秩序危機議程，這個特定主題必然會是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如何被激發，因為無論菁英如何煽動、客觀社經條件如何巨變，如果選民並沒有產生民粹主義態度，選民就不會從已有的政治分歧（Political Cleavage）或意識型態陣營中分離出來，民粹主義現象也就不會發生（Bornschieer, 2010）。是故民粹主義之「謎團」實際上就是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生成之謎。

第二節 研究問題

臺灣作為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經過民主鞏固之後，在短短的10年內就發生了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兩次大規模民粹主義現象，同時這兩次民粹主義現象跨越了既有的藍綠競爭版圖，明確的顯示民粹主義現象，對臺灣的民主發展潛在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此「謎團」在民主鞏固之後的臺灣顯然也是存在的。

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謎團」雖為新興議題，但「民粹」作為一個政治語彙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卻存在已久。在民主化初期它被當成是一個幼稚的公民社會，對於民主的偏差看法（黃光國，2003）。民主鞏固之後，它代表著選民或者政治人



物對政治一種盲目、反智的態度，除卻語彙上的表現，無論從社會現象或民意調查資料，臺灣的選民呈現了對民粹主義號召的積極響應，這種響應甚至跨越了臺灣堅實的兩黨競爭邏輯，使臺灣的民粹主義產生了與上述一樣的矛盾與謎題，急待更深入的研究談討。

本文並非第一個注意到此相似性的研究，臺灣既有之研究或使用經濟解釋（Yen, 2020）、或使用文化社會解釋（陳家洋，2020），但都出現證據或因果機制的不足。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認為需要在理論及方法上做創新：理論方面，本文透過觀察臺灣民粹主義現象多以反對執政黨且有利在野黨的特性，提出選舉輸家的假說，試透過方法方面，比較民粹主義研究的新研究法的應用來做驗證，並以此為本文的研究問題，探詢選舉輸家的身份相較於既有的解釋，是否更能夠解釋臺灣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起源。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將分為五個部分，以章節為分：緒論與問題意識、文獻回顧、理論架構與研究設計、研究結果、結論與討論。第一章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以及其對於學術社群之意義與預期貢獻。第二章預計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就民粹主義的定義、測量與解釋的各大理論做回顧，第二部分回顧臺灣的民粹主義史及其研究，並作出批評。第三章先綜合上述文獻回顧的內容進行理論與假設的產出，將選舉輸家作為激發民粹主義態度的整個因果關係建立清楚，再透過變數篩選來比較選舉輸家與既有理論的相對顯著性，來達成本文的實證分析。第四章將報告實證結果，完成之後利用邏輯斯迴歸來建構模型以達成控制與確認各解釋的勝算比，並VIF測驗做穩健性測試。最終第五章依據研究發現與實證結果做最終結論。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民粹主義及其解釋

壹、定義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 (Populism) 一詞最早出現在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末年，一部分的革命派以俄語自稱為民粹主義者，此詞傳至西方後被廣泛、鬆散地使用至今。這個概長期以一種非學術性的詞彙被使用，而此趨勢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末期 (Ionescu and Gellner 1969)，才出現學術性的討論。然而，民粹主義的概念化過程非常不順利，這個不順利的根本原因是民粹與其他概念的相似性，例如與排外主義的混淆。

針對這些現象，學界從「分類」開始切入。Canovan (1981) 開啟了這個嘗試，他從歷史的個案辨認，區分出七種不同的民粹主義，雖然這七個分類歧異過大，難以協助解決民粹主義定義紛雜的問題，卻毫無疑問地允許了1970年代針對民粹主義的幾個經典研究出現。拉丁美洲、美國與歐洲的個案被嚴謹分析 (Roberts 1995; Goodwyn 1978; Laclau 1977)，這些個案研究雖然仍然沒有解決定義問題，但已經成功的彙整出幾種分庭抗禮的民粹主義定義，供後人做比較。也是在這樣的成果下，2000年以後對話性的比較政治研究開始出現，其中以拉丁美洲、歐洲的研究最為經典 (De la Torre 2010, Weyland 2001)。

民粹主義研究發展到這個階段正好遭逢2008年的經融風暴，以及隨之而來席捲歐美的民粹主義風潮，西方媒體開始大量使用「民粹主義」來稱呼特定的政治人物、政黨。民粹主義的研究在此被排入國際比較政治研究議程上，研究者爭先恐後地嘗試要對新現象做出一番評論、解釋，在大量文獻的堆疊與對話之下，前述的研究累積獲得充分的利用，雖然對於民粹主義「是什麼」依然沒有定論，但關於它「不是什麼」學界已經有初步的共識，這個共識被稱為「觀念途徑」(Ideational Approach)



(Mudde & Kaltwasser, 2018)，這個途徑將民粹主義與單純的政治動員策略、排外國族主義等概念區隔開來，將民粹主義看成是概念的群集，而非一個獨立、整全的思想體系。這個概念群集目前較受到學界一致認可的元素為「人民主權」、「反菁英」以及一種「善惡二元式政治觀」(Rooduijn 2019)。

然而即便對民粹主義的定義有共識、且對民粹主義現象能夠清楚的辨認，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分析的基礎、一套架構來彙整。這個分析架構即是由Guiso等(2017)所提出的「供給-需求」模型。

這個模型將民粹主義看成是一種民主政治競爭中的「產品」，由民粹政黨、候選人提供，又由認同民粹主義的選民買單。從這個角度，民粹主義研究一分為二，一部分專注研究「供給者」——民粹主義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行為模式，另一部分研究「需求者」——民粹主義的支持者為何支持民粹主義。回到本文的問題意識，本文所探討的「解釋」很明顯便屬於民粹主義的需求側，而非供給側，固然民粹主義領袖的行為動機和策略對於認識民粹主義現象亦有貢獻，這不會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其研究發現亦不會成為回顧與引用的對象。

貳、解釋民粹主義態度

從國際上針對需求面的研究來看，當代民粹主義態度的解釋族繁不及備載，但眾多解釋可化約在四個類別之中：供給驅動、經濟危機、文化反撲與身份政治。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本文將這些解釋分類，但每個類別彼此之間並非完全涇渭分明，時而有互相引用與重合的現象，此分類與其說是民粹主義態度解釋的不同理論派別，不如說是切入並解答這個問題的角度，以下做分述：



一、供給驅動

雖然此處是討論民粹主義的需求面，但在民粹主義研究早期，供給面更受到重視，魅力領袖或極端政黨的煽動，被廣泛認為才是民粹主義現象發生的主因 (Halikiopoulou, 2019)。但此處不是要將民粹主義反過頭定義成一種政治動員的策略，而是強調民粹主義「由上至下」的強烈傾向。供給驅動解釋認為，雖然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概念集合共享於政治菁英與民眾之間，但這個概念集合的提出、加強與生存高度倚賴魅力領袖/政黨的持續煽動，故在供給驅動解釋中，選民的能動性是低的，民粹主義與其說是某種新的政治概念，不如說是舊概念的集合，為的是要替新政治菁英的上位建立正當性 (Urbinati, 2019)。

這種解釋途徑主要被應用在個人色彩強烈的民粹主義現象中，例如匈牙利的奧爾班 (Antal, 2019)、法國的勒龐 (Geva, 2020)、美國的川普 (White, 2016) 等案例，供給驅動理論認為這些政治領導人除了獨具魅力之外，也非常擅長「造市」，透過議程設定 (Agenda Setting) 與框架效應 (Framing Effect) 創造民粹主義的需求 (Mols & Jetten, 2020)。

供給驅動理論面對最大的挑戰便是過度強調政治菁英的能動性，以致於忽略了選民態度的研究，出現一種只分析菁英行動但沒有分析這些行動有沒有用的問題 (Golder, 2016)，這種分析上的缺失使得菁英的行動與選民的支持出現因果內生性問題：究竟是因為民粹主義領導人/政黨進行大量政治宣傳，而創造了廣大的民粹主義需求，還是民粹主義需求早已存在，政治菁英只是順勢而起 (Rooduijn, 2013)？



二、經濟不安全

經濟不安全解釋以供需理論的提出者Guiso等(2017),以及全球化負面影響研究者Rodrik(2018)為首。這派理論認為,民粹主義的出現與全球化發展有密切關聯,經濟與生產的全球化導致先進國家的中、低技術產業面臨劇烈競爭,全球化在每個國家區分出了「贏家」跟「輸家」,所謂的輸家不僅是傳統定義的失業人口,更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失業者」,這種人即使沒有實際失業的事實,也會對於個人與國家經濟前景有悲觀心態,而這種心態便被稱之為「經濟不安全」(Colantone & Stanig 2018; Dippel et al., 2017)。

根據此理論的分析,因為經濟不安全的焦慮心態,輸家們認為既有的政治菁英都是被贏家們圈養的應聲蟲,並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轉向尋找新的代表(Agency),政治競爭場域(Political Arena)於是出現了新的需求,民粹領袖與民粹主義政黨響應號召,將問題怪罪給全球化、移民,進而獲得政治的成功,其中最成功的案例便是川普勝選與脫歐公投(White, 2016)。

對於經濟不安全論的批評主要是來自於文化反撲論。批評者認為,經濟不安全論過度強調選民的工具理性,認為選民是工具性的支持民粹主義政黨以推翻既有的全球化建制力量,同時在迴歸分析中,文化因素亦屢屢被證明更能夠預測民粹主義態度(Wright et al., 2016; Bansak et al. 2016; Margalit 2012)。



三、文化反撲

「文化反撲」一詞是由Inglehart與Norris (2019) 首先共同提出，此理論認為經濟危機、全球化只是民粹現象爆發的「關鍵事件」，而非民粹主義的源頭。Norris指出以歐美為例，1970年代以來，社會與政治的主流議程逐漸從強調社會階級與資源分配的「物質主義」，轉向注重多元價值與少數權利提升的「後物質主義」，這個趨勢令西方社會中的保守選民感到焦慮，認為國家、民族與階級的主體性正在崩潰，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便已經開始尋找新的代表，這個新興的「代表關係」就是民粹主義風潮的來源，而這個新代表關係便是「反撲」的由來。

此理論的關鍵證據便是美國川普的勝選，過往的階級投票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價值投票：支持進步價值與多元平權的都市高教育水準選民支持民主黨，支持傳統價值的農村、鐵鏽帶支持川普與共和黨，取代過往勞動階級支持民主黨、資產階級與銀行家支持共和黨的基礎分佈。

針對文化反撲論的質疑主要是概念化與測量方面的批評，批評者多半認為「物質主義」以及「後物質主義」的概念界定模糊，難以量化並測量。更甚者是質疑文化反撲論的因果關係假設，Guiso等 (2017) 便指出文化反撲只是經濟不安的渠道的說法 (Cultural Channeling)，也就是說文化反撲實際上是起因於經濟不安全，是經濟的中間變項。即便如此，在當代民粹主義研究的多次驗證下，以歐美脈絡為主體的研究成果普遍認為文化反撲或文化相關解釋是最有解釋力的一種理論 (Moran & Litter, 2020; Inglehart & Norris, 2019)。



四、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的民粹主義解釋主要來自於對當代極右翼民粹主義現象的觀察，這種解釋認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概念的起源是一種新的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y)，此處指的「身份」係來自於Erikson (1994) 提出的建構式身份。過往有關身份政治的研究主要關注在少數群體 (Minority) 與社會主流政治互動的過程：社會中的少數透過各種途徑嘗試參與到社會與國家的運作之中 (Bernstein, 2005)。但近年一種新的「政治身份」逐漸在歐美社會中興起，這種政治身份並非以融入主流社會為目的，而是存在一種排他性 (Exclusionary) 的思維，甚至認為自己才是社會中的「沈默多數」。身份政治的民粹主義解釋理論認為，這種新身份的特質是造成歐美既有政治分歧 (Cleavage) 崩潰的主因，也是民粹主義現象的最重要基礎，這種排他性同時也是導致當代極化政治越發嚴重的原因，對於特定政治身份的堅持者來說，被「排除」的他者並不是真正的公民，自然也不需要對其在政治上做出任何妥協 (Noury & Roland, 2020; Meléndez & Kaltwasser, 2019)。

身份政治理論事實上參酌了非常多前述經濟或文化解釋，來釐清這個新的政治身份形成的原因，同時因為身份認同研究與社會學、心理學多有連結，這類民粹主義研究的方法取徑、理論假設都與政治經濟學或政治社會學不同 (Kaltwasser, 2021)。綜合而言身份政治理論認為，民粹主義的產生機制是選民對我群-它群 (Ingroup-Outgroup) 的偏見，一方面選民對我群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正面看法，認為因為這些正面特質，我群應該獲得更多的認可及政治權力；另一方面，選民對我群之外的它群則持有一種近乎陰謀論的厭惡與排斥，身份政治理論的支持者認為，這種雙重偏見建構了民粹主義發展的條件，政治對於我群來說就是與邪惡它群對抗的過程，而政治權力分配應該向我群，也就是「真正的人民」偏斜，這種因果機制的經典案例是波蘭法律與正義黨的崛起 (Marchlewska et al., 2018)。


身份政治理論是一個還在發展中的理論，其中包含的子理論非常龐雜，上述的因果機制也只是眾多被提出機制的其中一種，此外，這種我群它群雙重偏見的因果機制，僅對極右翼民粹主義解釋力較高，在左翼民粹主義盛行的南歐或南美洲，這種解釋途徑就較難以施展（Walters, 2018）。

第二節 民粹主義在臺灣

壹、臺灣的民粹主義現象

一、前民主鞏固時代：李登輝與陳水扁

黃昱珽與蔡瑞明（2015）認為，臺灣的民粹主義發展可以用「人民」與「他者」想像的形塑與演變來描述，他們認為這個分化的起源來自於民主化運動的概念遺產：因為民主化運動的獨特背景，本省人民對抗的不僅是一個「外族」，更是他們所掌控的威權體制，幾乎是巧合之下，人民與他者的想像變得複雜，社會反對力量以及「受壓迫的本省人」形塑成了臺灣民粹主義中的「人民」，而作為對立面，腐化的國民黨官僚與「外省權貴菁英」則成為的「他者」。回到觀念途徑的三個子概念，我們可以發現，本省人爭取更多政治機會進而成為民主化運動主體的概念，正好形成了「人民主權」；對外省威權體制的批判則成為了「反菁英」；最終，本省人民基於民族主義與民主追求的混合，在正當性與道德意義上與外省權貴威權體制的對立，滿足了「善惡二元論」的想像。這個人民與他者的想像透過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被引進臺灣政治之中，李登輝以本省人、民主化支持者的身份成為了臺灣民粹主義的第一個供給者，最終在1996年順利當選總統。按照這個分析，李登輝作為臺灣民粹主義的第一個案例應無問題。



在李登輝之後，基於前述的省籍對立架構，作為民進黨領導者、第二個本省籍總統的陳水扁理所當然的繼承了這個供需關係，繼續擔任民粹主義供給者的角色。而從經驗上，亦有學者指出陳水扁早在當選總統之前，於台北市長任期內就已經展現出民粹主義領導者的傾向（郭正亮，1998）。但是與李登輝不同的是，因為黨派差異，陳水扁的執政之路並不如李登輝那樣順利，而且在當選總統之前經歷了更多次的選舉考驗，也因為這個特色，陳水扁的民粹主義相較與李登輝又更加激進，並更著重在選舉競爭之上，也更強調改革（Shyu, 2008）。

在陳水扁及其後，臺灣民粹主義在供給與需求側都產生了變化。在供給側，選舉的角色獲得了強化：雖然在民主制度中，民粹主義因為強調更直接的代表性，本來就與選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但在李登輝時期，一來重要的權力鬥爭場域實際上是在國民黨內部，二來因為國民黨仍具有國會多數，透過黨紀與政黨資源分配，李登輝並不需要透過多次選舉來遂行民粹主義需求面的意志。但陳水扁作為民進黨的領導人，無論是在台北市長抑或總統任內，都沒有獲得議會多數，這導致陳水扁要滿足民粹主義的需求較為困難，因此以未來選舉勝利為目標的群眾動員，成為陳水扁民粹主義的特色。

在需求側，民族主義的色彩逐漸淡化：在李登輝時期，臺灣民粹主義有著非常明確的民族主義主題，也就是省籍對立，我們甚至可以說民粹主義是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化運動結合的副產品，但到了陳水扁時期，作為一個民粹主義供給者，民族主義的動員對需求面的吸引力似乎有所下降，這可見於陳水扁第二任期中轉趨激進的民族主義議程不受到支持的現象上（Matsumoto, 2009）。

雖然其後的馬英九完全不走民粹主義路線（劉世鼎、史維，2012），從後見之明我們知道，臺灣的民粹主義並不止於2008年陳水扁卸任，因此與其說是民粹主義失靈或消失，本文認為這可以看作是需求面出現質變。黃昱珽與蔡瑞明（2015）對於臺灣民粹主義的梳理至此為止，他們透過上述的變化推測，結論道臺灣民粹主義的人民與他者過去一直不斷地經歷再定義，並不僵固，具有變動性，而到該文出版



為止，作者認為經歷李登輝與陳水扁，臺灣民粹主義的人民他者已經非常具有政黨色彩，本文亦認同這個結論，同時依據陳水扁之後的民粹主義現象發展，臺灣的民粹主義應該以2008年的民主鞏固為一個重要的時代分界線。


二、後民主鞏固時代：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

2008年隨著第二次政黨輪替，臺灣進入民主鞏固階段（何振盛，2013），民粹主義在臺灣也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2008年後較被討論的兩個民粹主義現象是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Wu & Chu, 2020; 林文正、林宗弘，2020; 胡正光、江素惠，2020; 陳家洋，2020），本文遂主要視此兩個政治現象為民主鞏固時期臺灣民粹主義發展的延續。同時為使梳理方式一致，本文亦將使用人民他者想像作為回顧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的基礎。

太陽花學運指的是2014年3月18日開始，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為主要訴求發起的一連串街頭運動，由於本文並非著眼於探討太陽花學運始末，僅會簡要帶過整個學運過程，並主要著重分析其中被視為民粹主義的原因及人民他者想像的建構。

近年分析太陽花學運文獻繁多，然而甚少有文獻將太陽花學運視為民粹主義現象，這個理解的分歧除了「民粹」一詞在臺灣政治語境中充滿偏見且定義不明之外，研究議程上，太陽花學運也較被歸類在臺灣民族主義（吳叡人、林秀幸，2016）、「中國因素」反作用力的展現（吳介民、廖美，2015）、或大規模公民不服從的討論領域內（蔡佳泓、陳陸輝，2015）。

嚴肅討論太陽花學運的民粹主義特質的研究以陳家洋（2020）為始，他透過對太陽花學運的運動聲明稿分析，指出太陽花學運核心展現出「同質人民」、反對「腐敗菁英」、以及高舉「人民意志」三個民粹主義的重要概念：同質人民的部分，太陽花學運行動核心將服貿看作一個籠罩式的政策框架，會直接影響到所有臺灣人民的經濟利益與生計，因此太陽花學運是一場基於「主流民意」的運動（捍衛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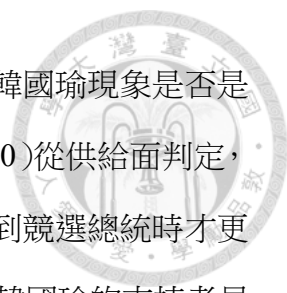


120小時行動聲明，2014），其意見與利益主體是同樣反對服貿的想像共同體「人民」；腐敗菁英的部分則主要見於太陽花學運核心對以國民黨為首的政治菁英的批評（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2014），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認為，對於反對民意無動於衷的國民黨黨政高層是腐敗且不可理喻的，他們對民意無視的唯一理由是官商勾結與來自中國龐大的利益輸送；最後，人民意志的部分，可見於太陽花學運核心對於當下局面提出的解方及其行動，解方主要見於他們對於黨紀制度的批評，認為國民黨以黨紀限制立委表決結果的方式反民主（捍衛民主120小時行動聲明，2014），至於行動部分即指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的行為，以實際行動展現出對代議政治制衡能力完全不信任。雖然陳家洋所指出的三種概念與本文準用的觀念途徑定義有些微差異，但綜合而言這三點與本文的三個概念構型可以互通，故本文認同此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人民他者的結構如何形成，在人民的部分，雖然臺灣民族主義透過反中的形式保存了下來，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的省籍鬥爭主調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將臺灣民族等同於臺灣人民的概念，嘗試對抗由國民黨引領的中國因素滲透進臺灣社會，而政治上，人民被想像成遭到政黨代表制度背叛，是政黨政治的「局外人」，同時人民經濟弱勢的形象開始被強調，與官商勾結的政經菁英形成鮮明對比。至於他者的部分，雖然國民黨很明顯的被標籤化，這個標籤已不再是族裔，而是對中國因素持正面態度者，同時是以政黨為主體、黨紀為工具的行政立法一體機器。

因為太陽花學運之後民進黨的選舉勝利，臺灣的民粹主義看似並沒有真的脫離前民主鞏固時期的民族主義主題，依然是臺灣民族主義的一種政治議程。但隨著2018年的韓國瑜現象，民粹主義支持者跨越了黨派，顯示民粹主義需求面的質變真實發生。

韓國瑜現象主要指韓國瑜從2017年投入高雄市長選舉開始，一直到2020年總統大選落敗的整個過程。因為韓國瑜個人領袖的特質，加上全球民主研究議程，韓



國瑜現象研究或多或少都碰觸到民粹主義的主題，但這不代表韓國瑜現象是否是民粹主義現象之判定就沒有爭議。舉例而言胡正光與江素惠(2020)從供給面判定，就認為競選高雄市長時的韓國瑜並不能稱為民粹主義領袖，是到競選總統時才更為明顯，相對，林文正與林宗弘(2020)則認為從需求面來看，韓國瑜的支持者早在2018年6月就已經出現明顯的民粹主義態度。本文綜合上述兩個觀點，基於民粹主義現象的供需結構分析，認為應該從較嚴謹的角度切入，以韓國瑜競選總統期間，亦即2018年韓國瑜勝選高雄市長之後的發展為分析重點，但無論孰是孰非，上述爭論的共識都是，韓國瑜現象確實是一種民粹主義現象。

因為韓國瑜強烈的個人風格，韓國瑜現象的人民與他者想像很大程度的取決於其個人發言與意識型態。韓國瑜最常被指出的民粹發言就是「庶民權貴」說(中時新聞網, 2019): 他透過自身經歷的塑造，將自己與其他政治人物區隔開來，自己不是「含金湯匙出生」的權貴，而是庶民，因此可以理解並代表廣大庶民的意見，而在韓國瑜及其支持者的語境中，庶民指的是臺灣廣大辛勤工作的勞苦大眾，但在官商勾結的腐敗菁英欺壓之下難以翻身，而權貴則是民進黨為首的政經集合體，以完全執政的姿態藐視「主流民意」(華視, 2019)。除此之外，其支持者對國民黨的黨政菁英也沒有多少好感，甚至出現批判態度，在爭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黨內提名時，韓國瑜也批評了國民黨內部對他的質疑與保留(Ettoday, 2019)，雖然沒有將國民黨也劃歸到權貴之中，但他顯然在強調只有自己才能代表庶民的利益，國民黨作為在野黨對民進黨的權貴制衡能力有限，或力不從心。與太陽花現象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人民的想像除卻臺灣民族主義的元素之外幾乎是別無二致，都是在經濟上的弱勢，都是沒有被政黨制度充分代表的受害者，而韓國瑜現象中的對他者的描述，去除了中國因素之後，也極其相似，都是獨攬行政立法權的黨政一體菁英群集。



綜合上面的回顧，臺灣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他者的演變可以總結如下表2-1所示：

表2-1：人民他者在四個民粹主義現象中的意義演變

	前民主鞏固時期		後民主鞏固時期	
	李登輝	陳水扁	太陽花學運	韓國瑜現象
人民	受壓迫的 本省大眾	本省-泛綠	「主流民意」 兩岸經貿輸家	「主流民意」 經濟弱勢
他者	把持金權的 外省精英	外省-泛藍	國民黨黨政英 兩岸經貿贏家	民進黨黨政菁英 經濟既得利益者
共同主題	省籍對立		政治代表性、經濟地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本文的最重要的研究問題是解釋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生成的因素，而不是描述，因此在簡單說明了臺灣至今為止的幾個民粹主義現象後，本文將回顧臺灣既有的研究如何解釋臺灣的民粹主義現象。

貳、解釋臺灣的民粹主義

既有針對臺灣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研究，多少都有碰觸到民粹主義現象的解釋問題，總體而言這些解釋約可以區分成四種，以下就這些解釋的推論、提出的因果機制以及證據作探討及批評。



一、供給——身份解釋

第一種針對臺灣民粹主義態度的解釋較為接近前述「供給驅動」與「身份政治」的融合，這種解釋主要見於早期的臺灣民粹主義研究，這類研究主要聚焦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的案例（黃光國 2003；王振寰、錢永祥 1995）。

按照這種解釋，臺灣的民粹主義支持源自於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派的政治鬥爭，其本質是菁英對權力的爭奪，而鬥爭之所以會「外溢」並轉化為民粹主義，是因為民主化的契機，選民的支持成為新的政治正當性來源，故政治菁英希望透過動員群眾來獲得政爭的勝利。以李登輝案例而言，他訴諸「臺灣主體意識」與「本省人」身份，將政治簡化為一種「本省人民」對抗「外省菁英」的善惡對決敘事，並以自己本省人的身份擔當「本省人民」的終極代表，最終裡應外合鬥垮了國民黨內部的非主流派，就是動員的成果。而在動員之下，省籍對立成為了臺灣民粹主義的需求面，故身份政治成為了臺灣民粹主義的需求面主體。依照這種論點，臺灣的民粹主義之需求面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換而言之，決定一個選民是否會出現民粹主義態度的關鍵，是選民自身的族裔與身份認同，也就是本省-泛綠的選民板塊組成。而這個因果機制的激發關鍵是供給者—民粹領袖的主動供給，如果以市場供需的角度來比喻，這是一種「製造需求」的途徑，民粹主義是因為領袖的出現而勃興，也必因領袖消失而消亡。

在1990年代這個解釋的提出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在1990年代及其後，省籍情結的競爭格局確實存在，另一方面這個推論邏輯與當時許多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個案研究非常相近，具有一定程度的經驗與理論支持（Seligson, 2007）。然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案例卻讓這個解釋出現漏洞。一如前述，在2000年總統大選後，臺灣民粹主義的供給者由陳水扁所繼承，以「臺灣之子」的形象扮演「本省人民」的民粹主義領袖，但當陳水扁政府在兩屆總統任期之間執政績效低落時，其試圖煽動民粹主義的嘗試卻沒有獲得本省-泛綠選民的廣泛支持（Matsumoto, 2009），這意味著雖然陳水扁有意擔任供給者的腳色，需求面卻對這個供給興趣缺缺，如果臺灣民


粹主義確實是供給驅動，為何會出現有供給卻沒有需求現象呢？由此可見，供給驅動的推論似乎並不完善。

這個推論的謬誤受到部份學者的注意，其中張佑宗（2009a）便以此現象為出發點，透過對民調數據的量化分析重新評估臺灣民粹主義的需求面，這個評估發現，民粹主義態度是一個廣泛存在於臺灣選民之間的思維，且是否具備這種思維與本省-臺灣-泛綠選民基礎並無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民粹主義在臺灣存在著一個基於「對民主的特殊想像」的「群眾基礎」，這種想像與多元主義式民主、威權懷舊、期待專家治國的菁英民主完全不同。這個研究不僅否證了供給解釋，更為後續的研究建立基礎，將臺灣的民粹主義支持解釋研究從供給導向轉往需求導向。

二、中國因素解釋

「中國因素」首先由吳介民（2009）提出，其定義為中國政府「以經逼政」滲透社會的手段。吳介民認為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在於，透過連結政治談判妥協與經濟利益的持續給予，來威脅利誘臺灣選民選擇較為親中的候選人。這個作用力及其反作用力被指出與2012年的選舉結果以及其後的太陽花學運非常相關，在實證研究中，選民對於中國的看法甚至能夠取代統獨立場預測投票行為的能力（吳介民、廖美，2015）。

這一派解釋推論，臺灣選民對於中國因素的忌憚，就如同西方民主國家中的全球化輸家對於經濟全球化的忌憚（陶儀芬，2008），那些沒有在兩岸經貿往來中獲益，或反受其害的選民遂對主張持續深化兩岸經貿關係的既有建制感到不滿，這些「輸家」認為自己的努力與未來遭到辜負與犧牲，自己是被忽視的純真人民，並將這種不滿轉嫁到執政的政治人物與政黨，建立起腐敗菁英想像的基礎。而因為對菁英失望，兩岸經貿往來中的輸家期待一個更直接回應民意、更能代表他們這些「人民」的政治體制，這種思維便成為民粹主義態度激發的關鍵。



此解釋的推論對於太陽花學運有極強的解釋能力，也成功跳脫供給導向的窠臼，但是在案例解釋力上，太陽花學運其後的韓國瑜現象，其支持者對於中國因素的看法顯然南轅北轍。中國因素對於韓國瑜現象的民粹主義態度影響，反而更像是反向關係：這些選民更希望維持與中國友好的經貿往來關係，反對執政黨的抗中政策。固然，我們仍可論證中國因素可能對於民粹主義態度的激發存在機制尚不明確的作用，但晚近的研究（Yen, 2020）卻發現證據的缺乏，無論選民對中國態度是正面或負面，統計上都沒有發現與民粹主義態度出現相關性。

三、傳統價值解釋

傳統價值解釋取自Norris與Inglehart提出的文化反撲理論（Cultural Backlash），引介了文化反撲對於民粹主義生成的推論與因果關係說明，認為臺灣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是源自於世代之爭及背後物質主義與新物質主義的碰撞。這個解釋主要以韓國瑜現象為重要案例。原因為2018年公投案中的同志婚姻相關公投案，及其後許多有關性別議題的爭議中，韓國瑜及其支持者與保守陣營多有連結（BBC, 2018），陳家洋（2020）亦在實證證據中發現年齡層較高的選民存在較高的民粹主義態度。

然而反對傳統價值作為民粹主義態度激發解釋的證據也一樣充分：經驗證據上最大的反例便是太陽花學運，是一場以年輕族群為支持基礎與參與者的運動（廖崇翰、陳陸輝，2021）；其次，雖然文化反撲理論以世代作為物質與後物質主義分野的關鍵，年齡在歷來的實證研究中已經被證明是一個過度寬泛的自變數（King, 1986），臺灣的世代應該如何劃分？兩個世代之間的價值差異為何？這些價值差異是否真的會導致民粹主義態度的生成？這些都是仍待發展與討論的議題。




四、收入不安全解釋

收入不安全解釋係根基於前述經濟不安全解釋，一樣是引介自比較民粹主義研究的既有理論，以經濟因素解釋民粹主義態度的生成。這種解釋認為，一如西方國家一樣，臺灣社會因為經濟全球化產生了愈發嚴重的機會不平等問題，使得部分選民對於自身的經濟地位、經濟前景出現不安與焦慮。選民在面對這些焦慮時開始歸咎經濟危機的始作庸者，也就是全球化下的既得利益者，一個人民他者的想像逐漸成形：他者是腐敗的全球化政經菁英，而人民是辛勤工作但受到忽略與虧待的純真大眾，這種對立最後轉化成，希望政府更有回應性、領導人更在乎人民利益的民粹主義態度。

經濟不安全作為一種概念操作化的途徑有非常多種，但在臺灣民粹主義研究中使用過的只有兩種，一是非技術勞工的身份、二是受試者主觀認定的「收入不安全」。前者以受訪者的職業與受僱情形為指標來測量全球化機會分配不均的狀況，並以此推論選民是否感到經濟不安全（林文正、林宗弘，2020；Yen, 2020），後者則以更直接的方式，直接就選民對於失去收入的可能性以及主觀經濟觀感的回答為測量基準（陳家洋，2020）。兩者之間又以後者，在採用觀念途徑下出現跨案例的顯著性（陳家洋，2020），因此在臺灣民粹主義研究的實踐中，經濟不安全的概念作為一種解釋，更精確來說應是「收入不安全」。

綜上的四種解釋，供給解釋遭到明確否證、中國因素與傳統價值欠缺證據支持，收入不安全似乎最能夠解釋臺灣民粹主義態度，一方面它有穩健的統計檢定結果，二方面這個結果能夠同時解釋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的民粹主義需求面，但其經濟觀感影響政治態度的推論邏輯，卻與臺灣既有的選舉研究發現相衝突。有關於政黨選舉以及選民對於經濟看法的關聯探討主要見於「經濟投票」相關文獻（吳親恩、林奕孜，2012），這些文獻認為，選民對自身經濟狀況的看法會決定其政治支持，這個觀點看似符合直覺以及選舉實踐的經驗，其背後的課責邏輯也可以非常好地與民粹主義探求新代表的主题做結合，但許多研究卻發現經濟觀感與政治態度



塑成存在著內生性問題，意即有可能是經濟觀感導致政治態度的轉變，亦有可能是政治態度的轉變影響選民的經濟觀感，故此理論其實存在著長期的爭辯，而在臺灣的選舉研究中，黃紀（2018）便透過定群追蹤的因果效應，探索2016年總統大選前後臺灣選民對於經濟發展的看法，並發現臺灣經濟觀感與政治態度塑成的關係更接近後者，是政治態度決定了選民對經濟的觀感，選民會因為所支持的政黨在選舉中失利而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感到悲觀，同時也會因為支持的政黨勝選而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感到樂觀。因此收入不安全與民粹主義態度的關係雖然有其證據，其因果機制仍需要再做研討。



第三章 理論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理論建構

在回顧臺灣民粹主義態度起源解釋時，我們可以發現既有的四種解釋似乎都有欠完善。而從數據實證的角度，除卻供給解釋明確地遭到否證之外，事實上都可以從既有資料中找到蛛絲馬跡，但當同時考慮多個民粹主義現象時，剩餘的三個解釋都在因果機制推論上出現不足。

這個不足並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除去中國因素解釋，經濟與文化解釋都是引介自國際比較民粹主義研究的成果。晚近以來許多東歐民粹主義研究（Hawkins et al., 2020）就發現，這種引介的做法存在著風險，以文化反撲與經濟不安全理論來說，他們雖然提供了很明確的概念操作化工具，但其推論倚賴的基礎依然是來自於偏西歐與北美的脈絡，換言之，這些理論即便獲得驗證，其預設的結論未必會適用於歐美以外的社會中，原本應該要用來解釋原因的理論在轉替脈絡之後便僅剩下呈現結果的功能。要真正解釋臺灣的民粹主義態度生成，勢必要從臺灣的脈絡出發，回過頭分析臺灣既有民粹主義現象的需求方如何產生。


當代民粹主義定義所強調的三種基本概念組成，民主化初期的臺灣基於其獨特的社會政治條件正好使其具足：本省普羅大眾與外省菁英權貴對立的想像形成民粹主義「善惡二元論」、「純真大眾對抗腐敗菁英」的兩大支柱，民主化運動的背景又正好將本土意識與「人民主權」這種對民主代表性的強調結合在一起，臺灣的「民粹主義式民主」於是誕生——一種強調民主是「人民做主」的民主想像（張佑宗，2009a）。這種民主想像並沒有隨著民主鞏固、省籍意識淡化而消失，而是真正轉化成一種在臺灣選民間普遍存在的民主概念。「他者」的身份從「外省菁英」轉化、擴散成任何被認為是違背民意、不「接地氣」的政經菁英。「人民」則從本省



籍臺灣人演變成被忽視的普羅大眾。這種民主想像成為臺灣民粹主義的需求面，在政治競爭之下為臺灣的兩大政黨所熟知，使其出現一種在野則宣稱代表普羅大眾、真實民意的行為模式，成為臺灣民粹主義的供給者，以此構成當代臺灣的民粹主義現象。

由於臺灣民粹主義的脈絡基礎依然是建立在人民他者的想像上，這個刺激民粹主義態度的關鍵因素，必須要創造一個新的人民他者想像，以支撐民粹主義態度的形成。除此之外，因為臺灣的民粹主義脈絡是高度政治性的，這個刺激的來源應與選舉競爭相關。與選舉競爭相關且能夠做到敵我劃分的因素，在過往在臺灣政治中多半被認為係黨性或政黨認同（陳陸輝，2000），而競選期間政治人物透過情緒動員所強化的政黨認同亦確實有可能成為激發民粹主義態度的關鍵。然而以最近的兩次民粹主義現象高峰來說，泛藍與泛綠的民粹主義運動分別在民進黨與國民黨執政期間發生，特定政黨認同所形成的身份顯非關鍵。雖然近年針對黨性的概念逐漸有檢討呼聲，有學者提倡以「負面黨性」來做更精準的測量（蕭怡靖，2009），但這種新測量依然有針對特定政黨，難以說明後民主鞏固時期，民粹主義現象橫跨政黨色彩發生的事實。那麼除卻黨性，還有什麼樣的身份會因為選舉而被重新塑造呢？選舉競爭下，除了在競選期間被政治菁英區辨出來的政黨身份外，最明顯的身份區分便是在選舉後出現的選舉贏家與輸家。

輸家同意理論（Loser's Consent）認為在選舉中競爭失敗的一方，也就是「選舉輸家」，容易對選舉的程序正義乃至民主制度的正當性產生懷疑（Anderson et.al., 2005），這種懷疑最終會凝結成選民對於民主態度的轉變。在過往臺灣的政治學研究中，選舉贏家與輸家的身份也被證明會影響選民對民主的態度，張佑宗（2009b、2011）指出在選舉中敗選的民眾較容易成為民主的批評者，同時對於直接民主的民主型態有更強的支持。黃信豪（2011）則發現2008年臺灣第二次政黨輪替時泛綠選民對民主制度的支持並沒有衰退，綜合這兩項發現，我們可以適切的推論，選舉輸



家的身份促使了臺灣選民對理想民主型態想像的轉變，意即，臺灣選民並沒有因為選舉失利而放棄民主制度，而是從原本的間接民主、代議制度等民主典範轉化成另一種更直接的型態，本文認為這種型態非常符合「民粹主義式民主」的想像。是故本文猜測，促成臺灣選民民粹主義態度激發的關鍵，應是選舉輸家的身份，且這個關鍵因素對於民粹主義態度生成的預測能力，超過既有存在實證證據的三種解釋。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與許多前述文章所關注的選舉層級一樣，都是中央的總統選舉，這是因為中央選舉的結果較容易受到選民政治態度、政黨認同的影響，地方選舉則不然（蕭怡靖、黃紀，2011）。因此本文往後「選舉輸家」的精確定義應是在上一次總統大選中投給非勝選候選人的選民。是故本文的假設如下：

「選舉輸家的身份相較於傳統價值、收入不安全與中國因素，更能夠解釋民主鞏固後臺灣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生成。」


第二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假設與研究設計

本文的假設為選舉輸家的身份相較於其他既有解釋更能夠預測民粹主義態度的生成，這個假設轉化為檢定的概念，實際上是一種理論之間的「競逐」。

在過往的政治學量化研究中，要進行不同理論的競逐最簡單的方式，是建立不同的線性迴歸模型並比較其顯著性與決定係數（R squared），透過參考這些數據我們便可以得出哪些自變數及其代表的概念與依變數更為相關。然而民粹主義的量化研究一直存在著一個難題：民粹主義指標的設定與測量。

雖然當今民粹主義的定義學界已經有所共識，將該定義操作化的指標也已存在，這些問項畢竟無法回溯到過去已經建成的大規模民意調查中，因此無論國際或



臺灣本土，當前運用既有調查資料的民粹主義量化研究都是採取變數組合的方式來建立民粹主義測量指標（陳家洋，2020；Yen, 2020；Mudde & Kaltwasser, 2018）。這個做法是有效且可受檢驗的，但它的劣勢是，直接將它用於相關性檢驗、模型建構時容易出現偏誤，簡言之，由於指標組合的本質，我們有時難以區分自變數與「民粹主義依變數」的相關性究竟是源自於對民粹主義總體概念的反應，抑或僅是與眾多民粹主義組成因素間的關係。若僅是要進行單一變數的相關性檢驗，這個問題或可忽略，但若要進行需要嚴謹判準的變數競逐則窒礙難行（Margalit, 2019）。

在無法改變既有資料結構的情況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近年比較民粹主義研究領域運用了變數篩選（Variable Selection）的創新方法。該方法不直接對自變數做相關性檢驗，而是先將眾多變數隨機組合，以這些組合對於總體模型估計依變數結果的效果優劣「篩選」自變數，這種方式獲得的結果將更具有統計的穩健度，並因為非直接進行相關係數比較，能夠繞過前述組合式的依變數所造成的推論難題。而在眾多變數篩選的過程中，我們也相當於在競逐他們所代表的理論。

在變數篩選的實踐方面，Becker（2017）首先採用貝氏信息量準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來探索脫歐公投與英國國會選舉投給各黨的選民特徵，獲得成功。Levi（2020）等進一步推廣這個方法，他們著眼於2018年的義大利國會選舉相關調查數據。除了BIC方法之外，他們進一步使用LASSO迴歸分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選定了多個自變數，分四個大類進行BIC與LASSO迴歸，最終根據此迴歸的結果建構模型，將此模型與歐洲其他國家民粹選民行為預測模型做比較，獲致極高的適配度。

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中，能夠達成變數篩選的工具實際上不僅一種，一如本文前段提到的BIC即是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的一種，但這種方法的變數組合方式係依照順序一一加入模型來測試總體預測能力是否上升，無法進行多元組合，不適合缺乏明確結構的數據探索。這也是民粹主義研究者轉向使用LASSO等正規化迴歸（Regularized Regression）的原因，因為這個此方法的篩選過程是同

時針對所有變數進行，並不需要像逐步迴歸一樣按照順序，可以更靈活地進行變數篩選。


正規化迴歸的運作原理係指透過檢測加入某特定變數，對減少模型平方誤差總和（Sum of Squared Error, SSE）的貢獻，以決定針對該變數是否進行「懲罰」，基於模型的設定條件，經過懲罰的變數就可能因而被模型捨棄。而決定正規化迴歸對無貢獻變數懲罰力度的，是正規化參數Lambda，其數值可以從0至無限大，當變數對減少後平方誤差總和的貢獻度非常低時，Lambda會逐漸增大，致使懲罰效果增強，可以使估計參數（Estimated Coefficients），也就是方程式中Beta值的最小化。除卻前述的LASSO，基於對估計參數（Estimated Coefficients）的處理，正規化迴歸又有另兩個子類型，分別是Ridge迴歸以及Elastic Net，這三個子類型之方程式如下式1至3：

$$\arg \min_{LASSO} = \sum_{i=1}^N (Y_{ij} - X_{ij}\beta)^2 + \lambda \sum_{j=1}^p \beta_j^2, \text{ 式1}$$

$$\arg \min_{Ridge} = \sum_{i=1}^N (Y_{ij} - X_{ij}\beta)^2 + \lambda \sum_{j=1}^p |\beta_j|, \text{ 式2}$$

$$\arg \min_{Elastic\ Net} = |Y - X_{ij}\beta|^2 + \alpha\lambda_1|\beta| + (1 - \alpha)\lambda|\beta|^2, \text{ 式3}$$

在方程式中，N代表總樣本數、p代表我們要篩選的特性（Features）數量，在變數篩選的應用中即代表自變數的數量，而λ則代表正規化迴歸中的「懲罰項」，因為當這個數值越大時，任一變數的迴歸係數歸零的速度會越快，故稱「懲罰」。經過上述說明，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理解這三種迴歸方法的區別，首先是LASSO與Ridge，其分別在於，LASSO對估計參數是採取絕對值的方式計算，而Ridge則是以平方數處理，兩者都可以使估計參數為正，但LASSO採絕對值的做法最終會讓Beta



歸零，而Ridge採取平方數的做法則無法將估計參數歸零，亦即無法真正做到變數篩選的目的。然而LASSO雖然懲罰效果較強，其絕對值計算卻也會把一群彼此互相相關的變數強迫篩選，僅剩下最後一個最具貢獻的變數，在變數彼此之間異質性較小的狀況時可能產生過度篩選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Zou 等（2005）提出了折衷方法，也就是Elastic Net，透過同時納入Ridge與LASSO的元素來均衡兩種迴歸的效果，透過調整Ridge與LASSO元素的權重來取得最佳結果。考量到本文使用的資料庫會是具有理論假設的主題式民意調查，其題組本身就有大量可能彼此相關的變數，LASSO過度篩選的劣勢將會非常明顯，故本文決定使用Elastic net來進行變數篩選。

貳、資料庫選擇與變數操作

一、資料選擇

在許多研究者的努力之下，臺灣存在著數個行之有年的穩健選舉調查資料庫，依據本文所欲進行的假設驗證，所選的調查資料庫必須達成三個標準：1)已被驗證過，有能力透過資料庫內問項建立民粹主義指標。2)具有足夠多元的政治態度測量問項來提供充分的變數，以同時測試既有幾個解釋與選舉輸家的民粹主義態度預測能力。3)其調查時間，必須要跨度到後民主鞏固時期的兩次臺灣民粹主義現象期間。以第一個標準而言，由胡佛東亞民主中心進行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在前述的臺灣民粹主義研究文獻中已經被多次使用（陳家洋，2020；Yen, 2020；張佑宗，2009），民粹主義指標從較為簡單的變數組合（Yen, 2020）到較為複雜的因素組合（陳家洋，2020）也都可見，故可以滿足第一個標準。至於標準二，依照本文提出的四個既有解釋，其問項皆能夠於ABS的問卷中找到，其詳細條目請見附錄二。最後標準三，ABS是一項四年一次的大規模民意調查，其中的第四波（ABS 2014）與第五波（ABS 2018）分別於2014年6月至11月與2018年

的7月至2019年1月完成，正好跨度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故亦符合本文的條件。最後，由於本文所欲測量的是，臺灣選民態度變化如何成為民粹主義現象發展的基礎，兩波調查時間在民粹主義現象發生的前後並不會影響到本文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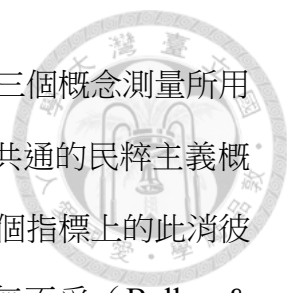


二、變數處理

(一) 依變數：民粹主義態度

本文的依變數是民粹主義態度。當代的民粹主義研究已經對於民粹主義定義存有共識，也就是「人民主權」、「反菁英」、「善惡二元式政治觀」的觀念群集，但在操作上該如何確認我們所選取的問題項可以用來充分測量上述的三種觀念，卻又是一個持續辯論的問題。如同上述的標準二，目前在實作上，使用ABS資料庫的臺灣民粹主義研究主要採取兩個策略，一是簡單變數組合法（Yen, 2020；張佑宗，2009），二是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陳家洋，2020），前者是針對作者所理解的民粹主義特徵與調查問項配對，並用簡單的加總或重設尺度（Rescale）以為統計中使用的依變數；後者則較前者更進一步，先進行一樣的步驟，其後以因素分析應證這些選出的問題項是否可以區分成好幾種不同的概念，並以新的因素為民粹主義的「人民主權」、「善惡二元」、「反菁英」概念，最後將三個因素予以相加以為統計的依變數。從兩者的步驟差異，就可以理解這兩種測量方式的基礎與民粹主義的定義發展脫不了關係，後者多做的一個步驟，便是為了包含觀念途徑中所提出的三個子概念，以提升測量民粹主義不同子概念的效果。這兩種作法在國際比較民粹主義研究之中以後者為主流，並以Akkerman等的研究為典範（2014），在ABS資料庫可以達成的情況下，本文為求嚴謹與效度便採取後者的作法。

然而為了進行統計迴歸分析，即便民粹主義是三個概念的集結，我們的依變數仍只能有一個數值，對於如何產出這個數值，歷來民粹主義研究多採用直接相合法，也就是將一個樣本在三個概念指標的得分直接相合，以這個分數為依變數（Mohrenberg et al., 2019; Schultz et al., 2017; Elchardus & Spruyt, 2016; Stavrakakis



et al., 2016; Akkerman et al., 2014)，這種作法的方法論論證是：三個概念測量所用的各個指標，其指涉固然是不同的意義，它們依然是出自於同共通的民粹主義概念，也就是共用一個因果關係，是殊途同歸，單一一個樣本在三個指標上的此消彼長並不會影響其具不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判定，予以相合並無不妥（Bollen & Lennox 1991）。

然而近年這種殊途同歸的論證遭到挑戰，新一派的學者Wuttke等（2020）認為「殊途」本身代表著每一個概念與民粹主義應該存在著不同的因果關係，彼此之間並沒有互換性故也無法進行代償（Non-compensatory），他們指出一個情況：設想在同一個資料庫中的兩個樣本，其一在「人民主權」、「善惡二元」、「反菁英」三個面相都得到1分得，總分3分，其二在「人民主權」得了3分但「善惡二元」、「反菁英」的因素都是0分，總分亦是3分，這兩個假想的樣本在總合之後都是「3分」，但其代表的概念顯有不同，若將這兩個樣本帶入迴歸進行推論，自變數針對這兩個樣本的「預測能力」其意義也絕對不同，甚至以假想樣本二的情況，三個概念中只有一個概念具足的狀況下我們還能夠說它是「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嗎？當然，這種純粹推論並不能直接否證掉直接相合法的殊途同歸邏輯，為驗證假說並解決這種方法論的潛在謬誤，他們提出第二種更嚴格的「條件式」判定法來驗證，條件式判定法與直接相合法對於對於指標與民粹主義定義之間因果關係的差異，請見圖3-1與圖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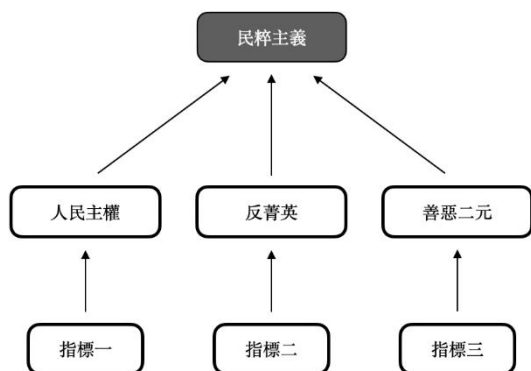


圖3-1 直接相合法的因果結構
資料來源：Wuttke, A et al.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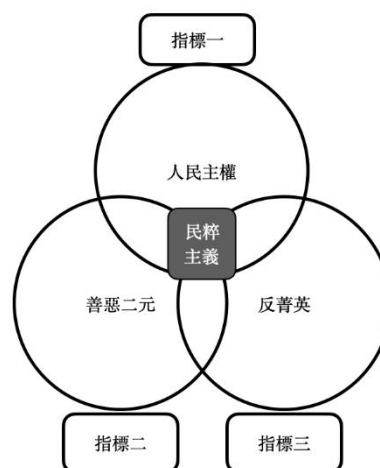


圖3-2 條件式判定法的因果結構
資料來源：Wuttke, A et al. 2020

這種方法改變原本直接相加的方式，一個樣本必須要三個概念指標上都不為零（或大於零，端看指標的尺度）才會被視為「具備民粹主義態度」。經過驗證，他們發現發現許多直接相合法得出的相關性，無法被更嚴謹的條件式判定法重製，因為這兩者的差異僅在於判定標準，新一派的學者遂認為，無法重製的事實代表後者的效度更高，由於民粹主義態度是本文推論與驗證的核心，若其測量出現偏差將嚴重影響結論的效度，故本文決定採取條件式判定法。

為製造出條件式判定指標，本文以觀念途徑的三個子概念為選取原則，參考陳家洋（2020）之研究結果來選擇ABS資料庫中相關的問題項，所選問題詳見附錄一。本文將各個類別中被選取的等距變數轉換為-2至 2，並在各類別之內相合。相合之後，一個樣本若在三個因素中都大於零，即重新編碼為1，反之為0，以此呈現選民是否同時具備民粹主義觀念的三個特徵，這個用於判定的新變數便為本研究的依變數。

需特別注意的是，「善惡二元論」所選之題組似乎與概念理解上的善惡區分無關，這是因為在陳家洋（2020）所進行的因素分析中，為確保各因素的效度有進行針對相反概念的效度檢證，「反菁英」因素組合必須要與「菁英主義」呈現顯著的不同，才能夠驗證效度（Shulz et al., 2017），而善惡二元的對立概念即為

多元主義，經驗證，僅有陳家洋（2020）原文顯示的問項有能力維持該效度要求，測量民粹主義。



（二）自變數：競逐理論

本研究之宗旨，即為透過同時對多個理論進行正規化迴歸達成理論競逐的目的，因此本文的自變數即為上述的既有解釋加上選舉輸家，其詳細問項請見附錄二，以下就各解釋的操作化進行說明：

1.選舉輸家

如上述，本文對於選舉輸贏效果的論證範圍僅限於總統大選，更精確而言是臺灣2012年與2016年的總統大選。本文故選擇ABS 2014與ABS 2018共用的選舉參與題：「請問您願不願意告訴我們，您的票是投給哪一組的候選人？」為操作化題目，本研究會依據受試者的填答，對照實際上選舉的贏家與輸家進行重新編碼，2012年以投給馬英九、蕭萬長為贏家、2016年以投給蔡英文、陳建仁為贏家，反之則為輸家，建立一個1/0的二項變數。

2.收入不安全

為測量經濟解釋對民粹主義態度的預測能力，本文依循臺灣既有研究以收入不安全為操作化定義，並選取三個指標來測量這個操作化定義，分別是：「您認為未來幾年後，我國經濟的情況會怎麼樣？」、「您覺得未來幾年後，自己家庭的經濟情況會變得怎麼樣？」以及「請問您會不會擔心未來一年內(自己的家庭)失去主要的收入來源？」。本文將三題的李克特量表結果相加，以為一連續變數。

3.傳統價值

本文所選之傳統價值題組參考至陳家洋（2020）的研究，選取五個傳統價值的變數進行相合，為一連續變數。



4.中國因素

有關中國因素之問項，本文參考Yen (2020) 的作法，以「一般來說，您認為中國（大陸）對於臺灣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為操作化指標，該題目有六個程度問項，本文以連續變數處理之。

最後針對原資料中的遺漏值與拒答變數，本文將採用K-Nearest Neighbour(kNN) 插補法進行處理 (Dixon, 1979)。

(三) 控制變數

為求本文實證結果的穩健，以及方便對比各個因素對於民粹主義態度的預測效果，本文將會在正規化迴歸後加入控制變數，進行邏輯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除卻既有的四個自變數，本文將控制人口變項（性別、教育程度、年齡）。此外，雖然本文針對選舉輸家的定義是以「在上一次總統大選時投給敗選候選人」，我們仍難以確信選舉輸家自變數對民粹主義態度展現出來的預測能力，真的是基於上一次總統大選的結果，因為一方面，使用任何其他與政黨相關的變數都容易出現完全共線的問題而失去測量意義，另一方面，因為ABS 2018在調查施作期間跨度到九合一地方選舉，選民的態度轉變確實有可能並不是因為較遠的總統大選結果造成，而是較近的地方選舉。為求穩健，本文將參考ABS 2018調查資料庫中，每一個樣本調查施作時間是在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前抑或後，製造一個二項變數以資控制。本文所使用的控制變數其原問項與重新編碼方式如附錄三。



第四章 敘述統計與交叉分析



在完成資料清理與編碼後，本文將先進行簡單的敘述統計，針對ABS 2014與ABS 2018本文所選的自變數、依變數、控制變數做視覺化呈現，簡單展示兩次調查資料中各項與本文相關變數的分佈。同時作為非常初步的，並針對本文所選控制變數、自變數與依變數進行交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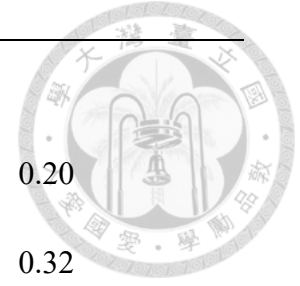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敘述統計

壹、依變數

如上述，本文的民粹主義依變數系透過條件判定的方式來區分有無民粹主義態度，一個樣本必須要在三民粹主義態度的概念子面相中都得到大於零的分數才會變重編為1，本文測量三個概念子面向的題組可參見附錄一，此處為求視覺簡潔便不收錄題目原文，僅以表2呈現三個子面向的各題在兩波調查中之平均結果，最終依照判定邏輯最終整理出兩波調查中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樣本比例。

表4-1：第四波第五波調查資料的選民民粹主義態度比例

	第四波	第五波
面向一：人民主權		
題一平均值	-0.59	-0.61
題二平均值	0.32	-0.34
兩題均大於零之樣本比例	30%	49%



面向二：反菁英

題一	0.37	0.20
題二	0.47	0.32
題三	0.58	0.16
三題均大於零之樣本比例	35%	53%

面向三：善惡二元

題一	0.04	-0.26
題二	0.53	0.36
題三	-0.36	0.01
三題均大於零之樣本比例	48%	50%
具民粹主義態度樣本數	481	220
不具有民粹主義態度樣本數	1176	1039
比例	29%	18%
總樣本數	1657	1259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從表4-1中我們可以看到，兩波具備民粹主義態度選民的比例有著不小的差異，這可能源自於兩波調查的樣本數差異，亦有可能代表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中被成功激發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比例存在差異，但這並非本文的研究核心，在缺乏更進一步分析的情況下亦不宜進一步推論。



貳、自變數與控制變數

本文所選之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其操作化方式都已在上段說明，此處將以一表4-2呈現ABS 2014、ABS 2018各變數之分佈，其中連續變數將以平均數呈現，並附上標準差。

表4-2：第四波與第五波調查自變數與控制變數之分佈

	第四波	第五波
選舉輸家		
輸家	43%	36%
經濟不安全態度 (3~14分，14分為最高)	8.27 (2.04)	8.37 (1.99)
反對傳統態度 (6~20分，20分為最反對)	13.15 (1.91)	13.42 (1.95)
忌憚中國因素 (1~6分，6分為最忌憚)	3.64 (1.17)	3.68 (1.12)
性別		
女	48%	49%
男	52%	51%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7%	18%
國、初中	14%	12%
高中	26%	27%
大專院校	35%	38%
研究所	8%	5%



年齡（以10歲為分群）		
20~29	15%	11%
30~39	18%	14%
40~49	20%	18%
50~59	22%	21%
60以上	25%	36%
九合一大選		
大選後收集樣本比例	N/A	29%
總樣本數	1657	1259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從上表3中可以看出，第四波以及第五波調查各項自變數的參數並無太大的差異。在控制變數方面兩波調查的樣本數有300多份的差異，而第五波調查有約三成的樣本系於當年度九合一地方大選結果宣布後搜集，其確切效果尚待統計檢定，至於其他由於其分佈系以臺灣選民的母體分佈為目標做抽樣，由於針對本資料庫的抽樣方法不是本文論證的焦點，故不做過度深入的討論。

自變數方面，選舉輸家之比例於第四波調查中稍高。而經濟不安全態度變數的平均值在3至14分之間均為8分左右、標準差在2左右。反對傳統價值態度平均值均約等於13分、標準差約等於2。忌憚中國因素平均值稍高於於3.6並有1.1左右的標準差。總體而言，本文關心的幾個自變數第四波與第五波調查皆無太大的波間差異。經過簡單的描述與整理，本文將進行近一步的交叉分析。

第二節 交叉分析



經過簡單描述兩波資料本研究所使用各項變數之分佈後，本文以調查波次為單位，分別查看每個自變數與民粹主義態度的交叉分佈。為求視覺上易讀，本文將第四波與第五波調查結果分別製成表4-3與表4-4：

表4-3：第四波調查自變數、控制變數與民粹主義態度之交叉分析

	有民粹主義態度	無民粹主義態度
選舉輸家		
輸家	64%	34%
經濟不安全態度平均值 (3~14分，14分為最高)		
	8.69 (2.07)	8.09 (2.01)
反對傳統態度平均值 (6~20分，20分為最反對)		
	12.64 (1.92)	12.95 (1.88)
忌憚中國因素平均值 (1~6分，6分為最忌憚)		
	4.02 (1.14)	3.49 (1.15)
性別		
女	52%	47%
男	48%	53%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2%	19%
國、初中	10%	16%
高中	28%	25%
大專院校	43%	32%
研究所	7%	8%




年齡（以10歲為分群）		
20~29	22%	12%
30~39	25%	16%
40~49	18%	21%
50~59	20%	22%
60以上	15%	29%
總樣本數	481	1176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從表4-3可以看到，在第四波調查之中民粹主義態度的有無與各項自變數、控制變數的交叉分配。首先在選舉輸家比例，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相較於沒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多了近30個百分點。經濟不安全態度平均值雖有差距，但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僅高出0.6分。反對傳統價值態度方面，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分數低了0.3分，意指較不反對。最後忌憚中國因素的部分，具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呈現了較高的平均值。在控制變數部分，除卻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教育程度分佈較高，其餘變數的交叉分佈都無太大差異。

表4-4：第五波調查自變數、控制變數與民粹主義態度之交叉分析

	有民粹主義態度	無民粹主義態度
選舉輸家		
輸家	53%	32%
經濟不安全態度平均值 （3~14分，14分為最高）	8.99 (2.00)	8.24 (1.97)
反對傳統態度平均值 （6~20分，20分為最反對）	13.65 (1.92)	13.36 (1.95)



忌憚中國因素平均值 (1~6分, 6分為最忌憚)	3.46 (1.24)	3.68 (1.95)
性別		
女	51%	52%
男	49%	48%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5%	19%
國、初中	11%	12%
高中	30%	26%
大專院校	39%	37%
研究所	5%	6%
年齡 (以10歲為分群)		
20~29	10%	10%
30~39	15%	13%
40~49	23%	16%
50~59	24%	20%
60以上	28%	41%
九合一大選		
大選後收集樣本比例	25%	29%
總樣本數	220	1039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表4-4呈現的是第五波調查的交叉分析。自變數方面，選舉輸家差距依然相當大，有21個百分點的差距。經濟不安全態度、反對傳統價值的分佈與第四波均相仿，唯獨忌憚中國因素變項，在第五波中是不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出現較高的平

均值。控制變數的部分，與第五波調查與第四波的交叉結果相仿，而第五波調查獨有的九合一大選效果變項，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屬於九合一大選後搜集的比例並沒有與總樣本的29%相距太遠。

總結第四波與第五波的交叉比較結果，論各變數在民粹主義態度有無的情況下分佈之差異，除卻選舉輸家變數明顯有很大差距外，其餘自變數的平均數皆非常相近，而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因素的忌憚之分佈差異在兩波調查之間出現相反的現象，在第四波中是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較忌憚中國因素，但在第五波中反而是不具有民粹主義態度的選民較忌憚中國因素，考慮到第四波調查與第五波跨度的民粹主義現象分別是立場反中的太陽花學運與立場親中的韓國瑜現象，變數差異的相反現象可以看作是運動主題差異的展現。

第五章 正規化迴歸分析與研究結果



第一節 理論競逐

完成依變數、自變數與控制變數的處理與簡要呈現後，本文遂行對Elastic Net最佳權重Alpha值的交叉驗證，將兩次調查各自以80/20的比例拆分，進行100次、以0.1為單位的機器學習驗證，得出最佳權重Alpha值為值為0.06與0.09。

確認了進行Elastic Net最重要的Alpha值後，本文對ABS 2014與ABS 2018建立兩個模型，由於交叉驗證的所得的Alpha值相對低，使得本文所準用的正規化迴歸偏向Ridge，故即便經過變數篩選，懲罰後Estimate並不會歸零。但因本文只需要針對眾理論進行競逐，並不需要倚賴Estimate歸零，故這個結果並不影響本文的假設檢定。最後，為求視覺上易讀，本文將兩個模型整理為圖5-1與圖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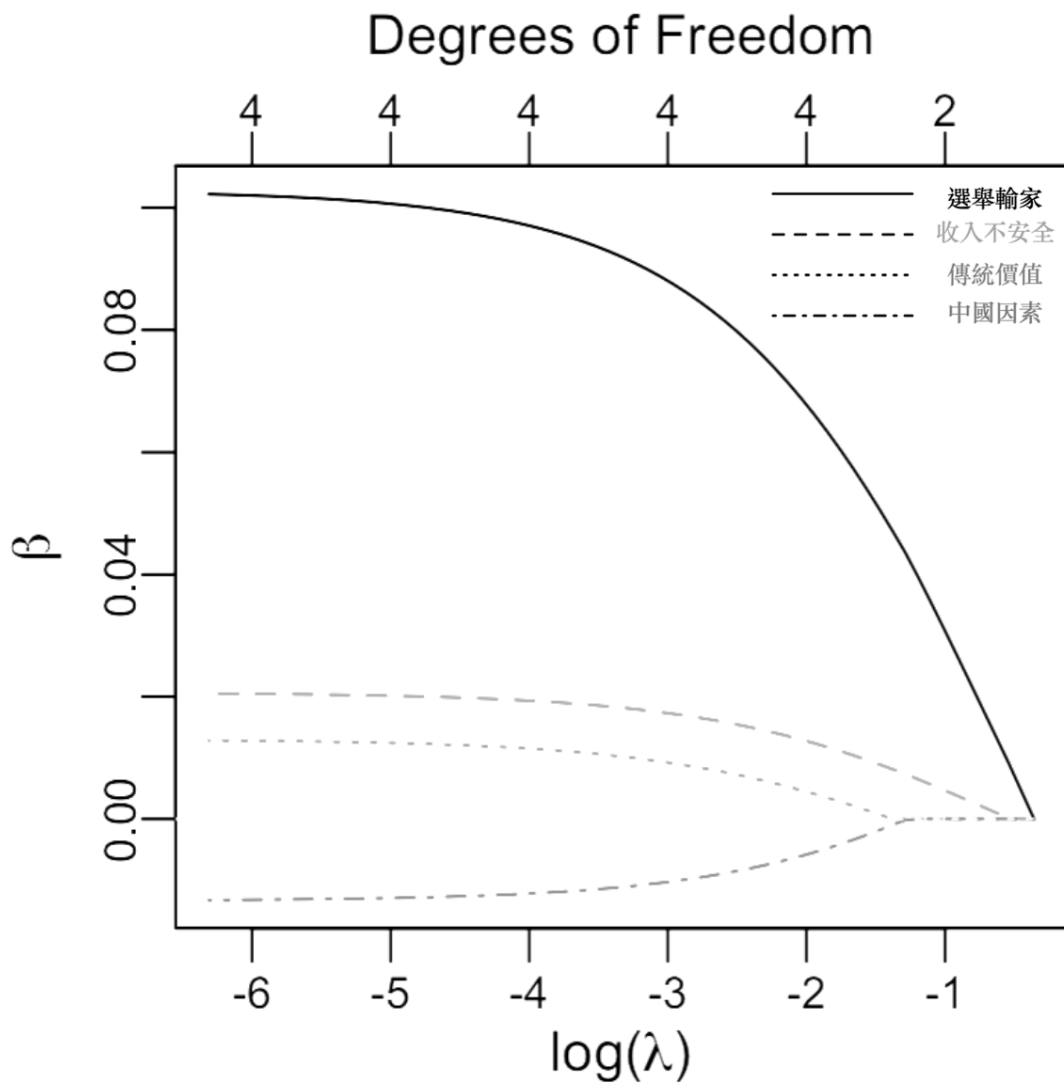


圖5-1 針對第四波調查的正規化迴歸結果

資料來源：ABS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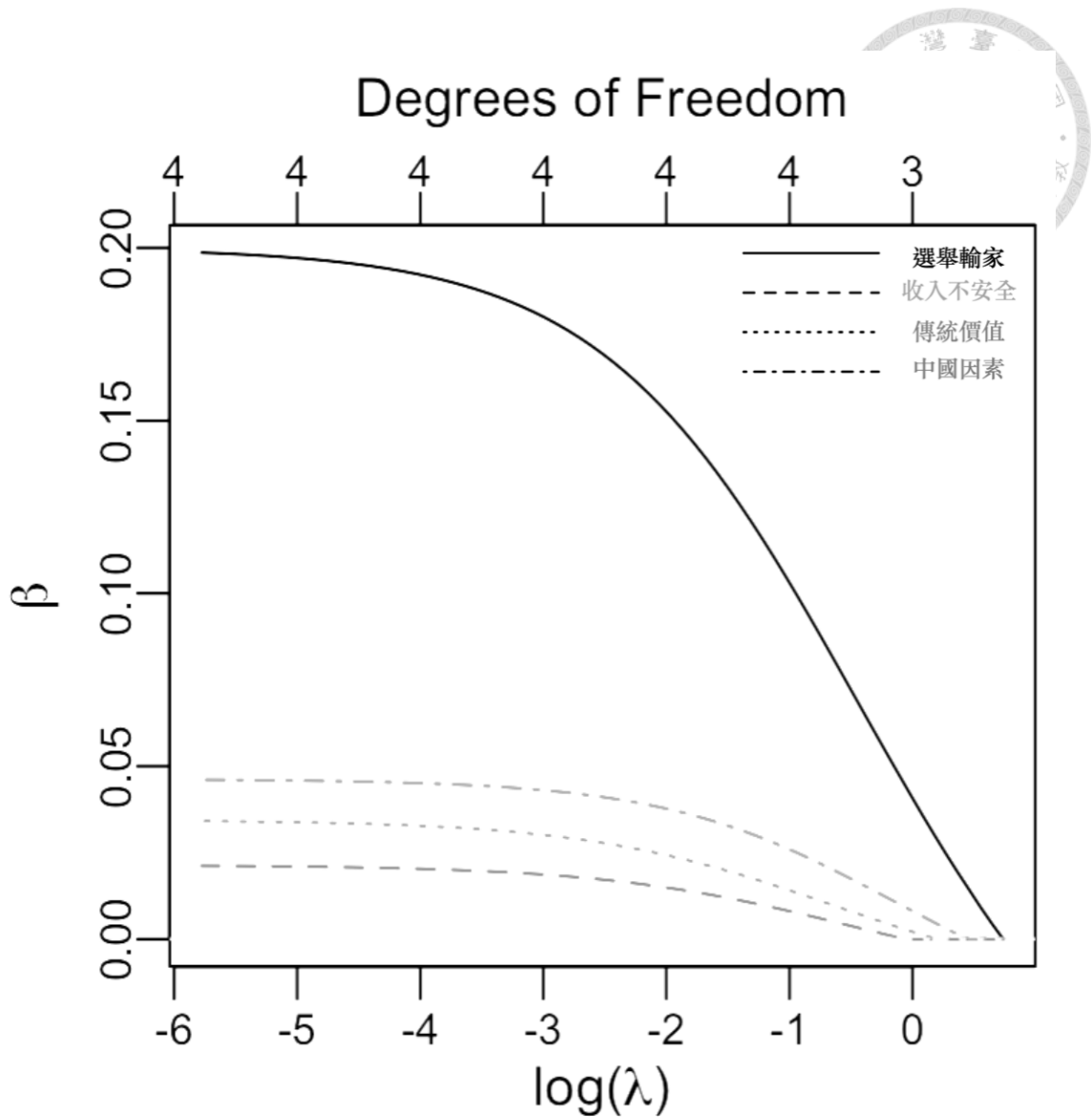


圖5-2 針對第五波調查的正規化迴歸結果

資料來源：ABS 2018

從圖中可以看到，經過正規化，無論是針對第四波或第五波資料，選舉輸家在所有自變數之間受懲罰的衰減速度是最低，Estimate則最高。除此之外，雖然這並非本文的研究範疇與探討重心，我們可以看到在第四波與第五波第二強的變數，分別是對中負面態度與收入不安全，似乎可以代表太陽花學運與韓國瑜現象兩次民粹主義現象中的重要主題。

第二節 模型建構與共線性檢測



壹、模型建模

雖然依據正規化迴歸的結果已經證實了本文假設，但選舉輸家對民粹主義態度的強度也僅是「相較之下」，其效果難以直接詮釋，而其顯著性在未經過充分控制也有欠穩健。為此，本文建構兩個模型，分別是沒有加入控制變數，僅以選舉輸家對上既有解釋變數的模型2014-1與2018-1，以及加入控制變數的模型2014-2與2018-2如表3及4：

表5-1：第四波與第五波未控制模型

	Model 2014-1	Model 2018-1
	Odds-ratio	Odds-ratio
選舉輸家	2.68***	1.99***
(輸家=1)	(0.00)	(0.00)
收入不安全	1.12***	1.15***
	(0.00)	(0.00)
反對傳統價值	1.21***	1.10*
	(0.00)	(0.02)
忌憚中國因素	1.26***	0.91
	(0.00)	(0.19)

說明：.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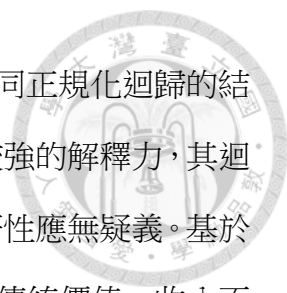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表5-2：第四波與第五波控制後模型

	Model 2014-2	Model 2018-2
	Odds-ratio	Odds-ratio
選舉輸家	2.68***	2.14***
(輸家=1)	(0.00)	(0.00)
收入不安全	1.16***	1.16***
	(0.00)	(0.00)
反對傳統價值	1.10**	1.04
	(0.007)	(0.37)
忌憚中國因素	1.30***	0.91
	(0.00)	(0.18)
年齡	1.02***	1.02***
	(0.00)	(0.00)
性別	0.79*	1.10
(男性=1)	(0.049)	(0.54)
教育程度	1.08	0.90
	(0.23)	(0.20)
九合一大選效果	N/A	0.88
		(0.47)

說明：. .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01$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從表5-1、表5-2中可以發現，無論第四波還是第五波，正如同正規化迴歸的結果顯示的一樣，選舉輸家相較於其他解釋對民粹主義態度都有較強的解釋力，其迴歸係數下降之速度與其他變數出現非常明顯的差距，其相對顯著性應無疑義。基於此正規化模型結果，本研究所假設的：「選舉輸家的身份相較於傳統價值、收入不安全與中國因素，更能夠解釋民主鞏固後臺灣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生成」獲得證實。

經過邏輯斯迴歸模型的建立，我們得以更清楚的看見每個變數的顯著性差異，以及透過odds-ratio來比較每個變數對民粹主義態度的相對預測效果。其結果充分反映正規化迴歸的結果，兩波調查中未控制的情況下，選舉輸家變數之odds-ratio都遠大於其他自變數，再證其解釋能力。


在加入控制變數之後，選舉輸家與其餘自變數之odds-ratio的差異沒有明顯縮小，甚至在第五波的資料中，選舉輸家與經濟不安全的odds-ratio差距在加入控制變數之後，也就是模型2-2，其差距反而拉大。

最後，針對第五波資料可能受到九合一選舉的影響所做的控制並不顯著，加上其他控制變數的加入，都沒有降低選舉輸家的odds-ratio與顯著度，同時這個結果即使在加入了控制變數下依然成立，

貳、共線性檢驗

本文所使用的各種民粹主義解釋之間雖然指涉不同概念，它們多少都受到類似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因素而牽動，彼此之間可能存在著程度不等的相關。除此之外，個別自變數與民粹主義態度依變數的關係，也可能因為其他自變數的影響而出現估計值偏誤或方向相反的問題，亦即多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故為求本文迴歸模型之穩健，本文採用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針對模型中的每一個自變數做檢測，其結果如下表 5-3：

表5-3：各模型之VIF



	Model 2014-1	Model 2014-2	Model 2018-1	Model 2018-2
	VIF	VIF	VIF	VIF
選舉輸家	1.08	1.10	1.18	1.21
收入不安全	1.02	1.11	1.05	1.10
反對傳統價值	1.01	1.24	1.02	1.20
忌憚中國影響	1.08	1.08	1.16	1.15
年齡	N/A	1.68	N/A	1.69
性別	N/A	1.04	N/A	1.02
教育程度	N/A	1.68	N/A	1.52
九合一大選效果	N/A	N/A	N/A	1.01

資料來源：ABS 2014, ABS 2018

有關於 VIF 究竟多少才能被視為足夠低，學界有許多討論，傳統上被認可的標準是低於 10 即可 (Vittinghoff et al., 2012)，但近來亦有研究認為此標準過於寬鬆 (James, 2017)，相關爭論仍在持續中，為求謹慎，本文採用 Johnston 等 (2018) 所訂下的最嚴謹標準 2.5。以此標準視之可見所有四個模型中的自變數其 VIF 值都在 2.5 以下，足證本文產出之模型並無多重共線性問題。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輸家的民主

透過本文的實證結果，得證在民主鞏固後的臺灣，最能夠解釋民粹主義態度生成的因素，是選舉輸家身份的獲得。本文將從臺灣民粹主義研究、以及比較民粹主義研究兩個層次來探討這個結果的意義。

壹、臺灣民粹主義研究

依據本文實證結果，選舉輸家身份的獲得能夠更好的預測臺灣選民之民粹主義態度，這個發現證實了本文的推論：臺灣民粹主義態度的起源是選民對於總統大選敗選的直接或間接反應。同時，民粹主義在臺灣民主脈絡中的真實意義是一種在民主這個概念底下的「典範轉移」——從自由民主或代議式民主轉向更直接、更激進的民主形式，這種民主典範因為臺灣民主化獨特的脈絡發展，與現代所理解的「民粹主義」不謀而合。然而如果將本文的結果理解為，敗選是民粹主義現象出現的唯一原因並不正確，本文的結果只能解釋民粹主義的需求面中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起源，一個民粹主義現象仍然有供給面與其他促成因素，每一個民粹主義現象也會有屬於自己的主題。

綜合來看，民粹主義在臺灣其實是一種「輸家的民主」，一方面這代表選舉輸家在臺灣有著激進化的傾向，不願意完全接受選舉結果，有著政治極化的隱憂，另一方面，雖然輸家不願意完全接受選舉結果，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直接揚棄民主制度的正當性，而是選擇訴求一種「更民主」的制度安排。這代表著民粹主義並沒有損及臺灣的民主鞏固成果，本文的這部分結論與本文文獻回顧到的，關於臺灣民主去鞏固、選舉輸家的研究類似。




最後，雖然規範性辯論並不在本研究的範圍之內，但本文的結果，亦可以作為民粹主義對臺灣民主發展是好是壞辯論的一項證據，傳統上「民粹」在臺灣因為政治場域的辭令使用而被認為是負面的，配合上當代自由民主秩序崩潰危機的國際議程，無論是太陽花學運還是韓國瑜現象，這些民粹主義現象都被看成是臺灣民主化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倒退危機（天下雜誌，2020；BBC, 2014），但參考本研究的發現，本文更傾向於Berman（2019）所提出的觀點，民粹主義並不是自由民主秩序崩潰的真正原因，而是崩潰的徵兆，以疾病來比喻，民粹主義更像是症狀（Symptom）而不是病灶（Lesion）。因此，民粹主義很可能只是某一種臺灣民主制度問題的反映，而臺灣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源起自選舉輸家的發現，表示這個問題非常有可能是臺灣總統選舉中「贏者全拿」的制度安排所導致，這種制度安排讓敗選的選民代表性全失，並傾向認為代議制度及立法權無法代表自己的意志，也無法對行政權起到真正的反制作用。這個制度性問題同時意味著無論政黨、意識型態如何更迭，民粹主義在往後的臺灣政治中依然會持續出現並再興波瀾。

貳、比較民粹主義研究

本文透過發展一個新解釋的方式，顯示既有民粹主義態度解釋理論在臺灣案例中適用性不足，然而，僅以臺灣一個案例的結果並不能代表既有理論被否證，但臺灣作為一個「異例」確實可以促進民粹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討論。

首先，選舉輸家這個解釋因素背後隱含的意義，是民粹主義態度激發的基礎是制度性的，但若考慮已有的民粹主義解釋理論，這也有可能可以納入到「身份政治」的理論架構中討論，只是這個身份並不是透過社會經濟因素達成區分，而是選舉的效應。

其次，選舉的「輸家」實際上就是在下一次選舉之前的在野勢力，換言之，以臺灣的案例來說是在野的選民更支持民粹主義，這個結果與近年歐洲的民粹主義研究發現完全相反，Van der Brug等（2021）透過28個歐洲國家的民意調查資料指



出，民粹主義存在著現任者效應 (Incumbency Effect)，意指當選民所支持的政黨執政時 (可理解為選舉贏家)，選民會顯示出對民粹主義態度更多的支持，相對，當成為在野黨的支持者時 (選舉輸家) 則更傾向支持自由民主價值。這個結果可能表示兩種意義，一是臺灣的選民因為臺灣民主體制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出現與歐洲不同的民主態度/認知，二是選舉贏家/輸家對民粹主義態度激發的效果與政府體制有關，也就是半總統制與議會制的制度差異。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方向

壹、研究限制

儘管本文已經盡可能嚴謹的去討論變數選擇、實證方法與回顧臺灣既有的民粹主義文獻，本研究依然有其限制：一是民粹主義依變數效度的問題，本文雖然採取了最嚴謹的條件式判定法，仍無法改變本文選用之指標都不是設計來直接測量民粹主義態度的事實，這個限制與本文所用之資料庫有關，也與本文使用二手資料進行研究的限制有關；二是本研究結果雖然使用兩次調查的資料結果，橫跨兩次大規模民粹主義現象，僅以兩次的案例要對未來做預測仍太牽強，威脅到本研究結果的外部效度，雖然在結論處本文預言了民粹主義會再次在臺灣出現，但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還會不會是因為選舉輸家身份而激發仍有待驗證；最後，有關於正規化迴歸以及機器學習在調查資料的應用上，爭議依然存在，有統計學者認為正規化迴歸與交叉驗證法並不適合運用在「小樣本」資料上，過往常見的應用多半是在大數據網路資料以及跨時普查資料中，其觀察值可能動輒上萬 (Finch & Finch, 2016)。雖然本文引用近期義大利選舉研究的例證，這並不完全能免除本文方法適用上的潛在問題。



貳、未來發展方向

臺灣的民粹主義研究從規範性辯論與實證檢驗，再到今天的分析與探源，期間的創新一是透過政治事件的更迭、二是透過國際議程的刺激，本文所處的時間點正是這兩種刺激的組合：民主鞏固之後的太陽花學運及其後的韓國瑜現象，配合席卷西方的民粹主義浪潮。即便有上述的種種限制，以民粹主義態度如何出現的角度而言，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同時也是相較於既有解釋更穩健的解答。當然，此處不是要妄言這就是臺灣民粹主義態度解釋研究的終點，恰恰相反，這是一個起點，本研究展示了透過機器學習等新興技術，既有的資料庫依然有能力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於臺灣民粹主義發展的重要資訊。事實上，本文的研究結果開啟了更多值得研究的主題，其中最具有潛力者，是近一步深入分析本文正規化迴歸與四個模型中的額外發現：雖然選舉輸家被驗證為最顯著的自變數，緊隨其後的自變數正好都是相應民粹主義現象的重要因素（太陽花學運中的中國因素、韓國瑜現象中的收入不安全感），近年逐漸有民粹主義研究嘗試針對這種現象做更進一步的統計處理，例如進行中介效應分析（Rhodes-Purdy et al., 2021），並用這種方式把既有理論與新理論做整合，建立更強健的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這大可以是本文繼續發展的一個方向，在當中所得的結論，可透過跨國比較的方式來驗證外在效度，特別是對比多個文化、政治脈絡底下的民粹主義案例。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BBC，〈臺灣選舉 2018：公投熱點 —— 同性婚姻和同性教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315326>，2018/11/24。
- BBC，〈觀察：臺灣太陽花 -- 未盡的學運，崩壞的民主？〉，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14/04/140415_ana_taiwan_student_sunflower_lower，2014/04/15。
- Ettoday，〈快訊／韓國瑜5點聲明！ 「我沒有辦法參加現行制度初選」〉，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423/1427547.htm>，2019/04/23。
- 中時新聞網，〈韓國瑜頻喊莫忘世上苦人多 他籲別小看這句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10000846-260407?chdtv>，2019/06/10。
-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2014，「捍衛民主 120 小時」行動聲明，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1364d3ef-cd58-4644-8ee5-e3cc76047731>，
2014/03/17。
- 天下雜誌，〈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為什麼來到臺灣就失靈了？〉，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8666>，2020/03/14。
-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7-55。
- 何振盛，2013，〈臺灣政黨變遷與憲政發展對其民主鞏固之影響〉，《發展與前瞻學報》，1: 65-112。
- 吳介民，2009，〈中國因素與臺灣民主〉，《思想》，11: 141-157。
- 吳介民、廖美，2015，〈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 《臺灣社會學》，(29): 89-132。
- 吳叡人、林秀幸主編，2016，《照破：太陽花運動的震幅、縱深與視域》，臺灣：左岸文化。
- 吳親恩、林奕孜，2012，〈經濟投票與總統選舉效度與內生問題的分析〉，《臺灣政治學刊》，(16)2: 175-232。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 1970-86〉，《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8: 133-206。
- 林文正、林宗弘，2020，〈韓流與柯粉：臺灣民粹政治的社會起源〉，《香港與臺灣的社會政治新動向》，頁91-140。
- 林淑芬，2005，〈“人民”做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2: 141-182。
- 胡正光、江素慧，2020，〈民粹主義在臺灣— 韓國瑜及其支持者〉，《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6(3): 155-183。
- 張佑宗，2009a，〈搜尋臺灣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5: 85-113
- 張佑宗，2009b，〈選舉輸家與民主鞏固：臺灣 2004 年總統選舉落選陣營對民主的態度〉，《臺灣民主季刊》，6(1): 41-72。
-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臺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臺灣民主季刊》，8(2): 99-137。
-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臺北：商周。
- 陳家洋，2020，《物質主義的反撲：臺灣社會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 陳陸輝，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09-141。
- 陶儀芬，2008，〈全球化、民粹主義與公共知識社群〉，《思想》，9: 223-231。
- 華視，〈韓國瑜再度開砲！稱民進黨「愛錢愛權愛自己」〉，



<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1910/201910281979316.html> , 2019/10/18 。

黃光國，2003，《民粹亡臺論》，台北：商周出版。

黃信豪，2011，〈民主態度的類型：臺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18(1): 1-34。

黃昱琄、蔡瑞明，2015，〈晚近臺灣民粹主義的發展：「人民」與「他者」想像的形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3(3): 127-163。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2014，〈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https://www.cooloud.org.tw/node/77868>，2014/03/23。

廖崇翰、陳陸輝，2021，〈人格、興趣、黨性：解析臺灣大學生參與太陽花示威運動的因素〉，《臺灣政治學刊》，25(2): 69-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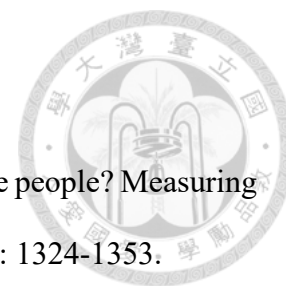
劉世鼎、史維，2012，〈去政治化的臺灣政治〉，《思想20：儒家與現代政治》，(20): 79-108。

蔡佳泓、陳陸輝，2015，〈「中國因素」或是「公民不服從」？從定群追蹤樣本探討太陽花學運之民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4: 573-603。

蕭怡靖，2009，〈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政黨認同測量的探討〉，《選舉研究》，16(1): 67-93。

蕭怡靖、黃紀，2011，〈施政表現在不同層級地方選舉中的影響：2009年雲林縣縣長及鄉鎮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18(2): 59-86。

貳、西文部分



- Akkerman, A., Mudde, C., and Zaslove, A. 2014. How populist are the people?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in vote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9): 1324-1353.
- Anderson, C. J., Blais, A., Bowler, S., Donovan, T., and Listhaug, O. (Eds.). 2005. *Losers' consent: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tal, A. 2019. *The rise of Hungarian populism: State autocracy and the Orbán regime*.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 Bansak, K., Hainmueller, J., and Hangartner, D. 2016. How economic, humanitarian, and religious concerns shape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 asylum seekers. *Science* 354(6309): 217-222.
- Bernstein, M. 2005.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1): 47-74.
- Berman, S. 2019. Populism is a symptom rather than a cause: democratic disconnect, the decline of the center-lef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Polity* 51(4): 654-667.
- Becker, S. O., Fetzer, T., and Novy, D. 2017. "Who voted for Brexit? A comprehensive district-level analysis." *Economic Policy* 32(92): 601-650.
- Bollen, K., and Lennox, R. 1991. Conventional wisdom on measurement: A structural equation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2): 305-314.
- Bornschier, S. 2010. *Cleavage politics and the populist right: The new cultural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1-41.
- Canovan, M. 1981. *Popu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De la Torre, C. 2010.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 2012.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 *China Information* 26(3):277-302.

Dippel, Christian, Robert Gold, Stephan Heblich, and Rodrigo Pinto. 2017.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Causal Mechanisms: Unpacking the Effect of Trade on Workers and Vot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ixon, J. K. 1979. Pattern recognition with partly missing data.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9(10): 617-621.

Colantone, Italo, and Piero Stanig.

———.2018a.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rexi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2(2): 201–218.

———. 2018b.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Cultural Backlash’: Globalization and Attitudes in Western Europe.”*BAFFI CAREFIN Centre Research Paper*. 2018–2091.

———. 2018c. “The Trade Origin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Western Europ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4): 936–953.

Elchardus, M., & Spruyt, B. 2016. Populism, persistent republicanism and declin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pulism as a thin ideolog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51(1): 111-133.

Erikson, Erik H. 1994.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Finch, W. H., and Finch, M. E. H. 2016. Regularization methods for fitting linear models with small sample sizes: Fitting the Lasso estimator using R. *Practical Assessment,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21(1): article 7.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Geva, D. 2020. Daughter, mother, captain: Marine Le Pen, gender, and populism in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 Society* 27(1): 1-26.
- Golder, M. 2016. Far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477-497.
- Goodwyn, L. 1978. *The populist mom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iso, L., Herrera, H., Morelli, M., & Sonno, T. 2017.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London, UK: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Halikiopoulou, D. 2019. Right-wing populism as a nationalist vision of legitimating collective choice: A supply-side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4(2): 35-49.
- Hawkins, K. A, Kaltwasser, C. R. and Andreadis, I. 2020. "The Activation of Populist Attitud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55(2): 283–307.
- Huang, C. 2018. Testing Partisan Effects on Economic Perceptions: A Panel Design Approach. *選舉研究* 25(2): 89-115.
- Inglehart, R., and Norris, P. 2019. *Cultural Backlash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onescu, G., and Gellner, E. 1969.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 James G, Witten D, Hastie T, Tibshirani R. 2017. *An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s in R. 1st ed. 2013, Corr. 7th printing 2017 edition*. Berlin: Springer.
- Johnston R, Jones K, Manley D. 2018. Confounding and collinearity in regression analysis: a cautionary tale and an alternative procedure, illustrated by studies of British voting behaviour. *Qual Quant* 52(4):1957-1976.
- Kaltwasser, C. R. 2012. The ambivalence of populism: threat and corrective for.



-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19(2): 184-208.
- Kaltwasser, C. R. 2021. Bring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into the study of populism.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2).
- King, G. 1986. How not to lie with statistics: Avoiding common mistakes in quantitative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3): 666-687.
- Laclau, E.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populism."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143-200.
- Levi, Eugenio, and Fabrizio Patriarca. 2020.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opulism: The Municipality-Level Predictors of Electoral Outcomes in Italy." *Economia Politica* 37(3): 833–75.
- Margalit, Y. 2012. Lost i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popular discont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3): 484-500.
- Margalit, Y. 2019.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causes of popu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152-70.
- Marchlewska, M., Cichočka, A., Panayiotou, O., Castellanos, K., and Batayneh, J. 2018. Populism as identity politics: Perceived in-group disadvantage,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support for populis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2): 151-162.
- Matsumoto, Mitsutoyo. 2009.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en Shui-bian*. In Kosuke Mizuno & Pasuk Phongpa-ichit (Ed.), *Populism in Asia*.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181-201.
- Meléndez, C., and Kaltwasser, C. R. 2019. Political identities: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study of populism. *Party Politics* 25(4): 520-533.
- Mols, F., and Jetten, J. 2020. Understanding support for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toward a model that captures both demand-and supply-side factors. *Frontiers in*

- 
- Communication* 5: 557-561.
- Mohrenberg, S., Huber, R. A., and Freyburg, T. 2021. Love at first sight? Popul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direct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27(3): 528-539.
- Moran, M., & Littler, J. 2020. Cultural populism in new populist t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6): 857-873.
- Mudde, C. 2018. How populism became the concept that defines our age. *The Guardian* 22(11).
- Mudde, C., and Kaltwasser, C. R. 2018. “Studying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13): 1667–1693.
- Noury, A., and Roland, G. 2020.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ism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421-439.
- Roberts, K. M. 1995. 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Peruvian case. *World politics* 48(1): 82-116.
- Rooduijn, M. 2013. *A Populist Zeitgeist?: The Impact of Populism on Parties, Media, and the Public in Western Europe*. Amsterdam: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 Rooduijn, M. 2019. “State of the field: How to study populism and adjacent topics? A plea for both more and less focu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8(1): 362-372.
- Rodrik, Dani. 2018.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1): 12–33.
- Seligson, M. A. 2007. The democracy barometers (part I):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 81-95.
- Schulz, A., Müller, P., Schemer, C., Wirz, D. S., Wettstein, M., and Wirth, W. 2018.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on three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 Opinion Research* 30(2): 316-326.
- Shyu, H. 2008. Populism in Taiwan: the rise of a populist-democratic culture in a democratising society.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2): 130-150.
- Stanley, B., and Czeńnik, M. 2019. "Populism in Poland." In *Populism around the world*, eds. Stockemer, D. Springer. New York: Springer, Cham, 67-87
- Stavrakakis, Y., Andreadis, I., & Katsambekis, G. 2017. A new populism index at work: identifying populist candidates and par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Greek contex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4): 446-464.
- USA Today. 2021. "President Trump supporters violently storm Capitol Hill: Here's everything we know."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21/01/06/capitol-hill-riot-heres-everything-we-know/6573033002/> Last updated 6January 2021.
- Urbinati, N. 2019.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11-127.
- Walker, C. 2018.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29(3): 9-23.
- Van der Brug, W., Poppo, S., Hobolt, S. B., & Schmitt, H. 2021. Democratic Support, Populism, and the Incumbency Effect. *Journal of Democracy* 32(4): 131-145.
- Vittinghoff E, Glidden DV, Shiboski SC, McCulloch CE. 2011. *Regression Methods in Biostatistics: Linear, Logistic, Survival, and Repeated Measures Models. 2nd ed. 2012 edition*. Berlin: Springer.
- Walters, S. D. 2018. In defense of identity politic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43(2): 473-488.
- White, J. K. 2016. Donald Trump and the scourge of populism. *The Forum* 14(3): 265-279.
- Wright, M., Levy, M., and Citrin, J. 2016.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policy.

across the legal/illegal divide: The role of categorical and attribute-based decision-making. *Political Behavior* 38(1): 229-253.

Wuttke, A., Schimpf, C., and Schoen, H. 2020. When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pulist attitudes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2): 356-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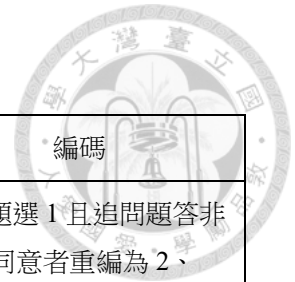
Wu, C., and Chu, Y. 2020. "Chapter 2 Populism in Taiwan: A Bottom-Up Model." In *Popu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Leiden: Brill.

Weyland, K. 2001.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1): 1-22.

Yen, W. T. 2021. Labor Market,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Populism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7(1): 161-189.

Zou H., and Hastie T. 2005. "Regularization and variable selection via the elastic net."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67(2): 301-320.

附錄一




	題目	選項	編碼
人民主權	<p>□1. 政府領導人應該做選民想要他們做的事</p> <p>□2. 政府領導人應該做他們認為對人民最有利的事</p> <p>追問: (82a) 請問您是同意還是非常同意這種說法呢?</p>	<p>雙層問項： 二選一後追問 同意或非常同意</p>	<p>第一題選 1 且追問題答非常同意者重編為 2、 第一題選 1 且追問題答同意者重編為 1、 第一題選 2 且追問題答同意者重編為-1、 第一題選 2 且追問題答非常同意者重編為-2</p>
	<p><u>第五波：</u> 政治人物根據智慧而不是人民的喜好來做事，以確保社會集體福祉。</p>	<p>1~10 (10 為非常同意)</p>	<p>1~2 重編為 2、3~4 重編為 1、5~6 重編為 0、7~8 重編為-1、9~10 重編為-2</p>
	<p><u>第四波：</u> □1. 政府是人民所雇用的，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需要做什麼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定</p> <p>追問: (80a) 請問您是同意還是非常同意這種說法呢?</p>	<p>雙層問項： 二選一後追問 同意或非常同意</p>	<p>第一題選 1 且追問題答非常同意者重編為 2、 第一題選 1 且追問題答同意者重編為 1、 第一題選 2 且追問題答同意者重編為-1、 第一題選 2 且追問題答非常同意者重編為-2</p>
反菁英	<p>您認為中央政府官員常不常對大眾隱瞞重要訊息?</p>	<p>□1. 都是這樣 □2. 大部分這樣 □3. 有時候這樣 □4. 很少這樣</p>	<p>都是這樣編為 2 大部分這樣 1 有時候這樣-1 很少這樣-2</p>
	<p>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p>	<p>□1. 非常普遍 □2. 經常這樣 □3. 有時候這樣 □4. 很少這樣</p>	<p>非常普遍編為 2 經常這樣 1 有時候這樣-1 很少這樣-2</p>
	<p>請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p>	<p>□1.幾乎沒有 □2.沒有多少人 □3.相當普遍 □4.幾乎人人都貪</p>	<p>幾乎沒有-2 沒有多少人-1 相當普遍 1 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 2</p>

		汙腐化	
善惡二元論	請問您認為我們的選舉常不常讓選民有機會挑選出可以接受的政黨或候選人？	<input type="checkbox"/> 1. 都是這樣 <input type="checkbox"/> 2. 大部分這樣 <input type="checkbox"/> 3. 有時候這樣 <input type="checkbox"/> 4. 很少這樣	都是這樣-2 大部分是這樣-1 有時候這樣 1 很少這樣 2
	請問您認為政府是否積極回應人民的需求？	<input type="checkbox"/> 1. 很積極 <input type="checkbox"/> 2. 還算積極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太積極 <input type="checkbox"/> 4. 一點也不積極	很積極-2 還算積極-1 不太積極 1 一點也不積極 2
	<u>第五波：</u> 請問您認為選舉有多大效力能促使政府回應人民的需求？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有效 <input type="checkbox"/> 2. 相當有效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大有效 <input type="checkbox"/> 4. 完全沒效	非常有效-2 相當有效-1 不太有效 1 完全沒效 2
	<u>第四波：</u> 請問您認為選舉是否能促使政府重視人民的想法？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有可能 <input type="checkbox"/> 2. 有可能 <input type="checkbox"/> 3. 沒有多少可能 <input type="checkbox"/> 4. 完全沒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2 有可能-1 沒有多少可能 1 完全沒有可能 2

附錄二



	題目	選項	編碼
選舉輸家	<p>請問您願不願意告訴我們，您的票是投給哪一組的候選人?</p> <p>34a.訪員自填:根據第 34 題, 受訪者是投給勝選陣營或敗選陣營?</p>	<p><input type="checkbox"/>1.投給勝選陣營</p> <p><input type="checkbox"/>2.投給敗選陣營</p>	<p>以訪員自填題為準，敗選編為 1，勝選編為 0</p>
收入不安全	<p>您認為未來幾年後，我國經濟的情況會怎麼樣?</p>	<p><input type="checkbox"/>1.好很多</p> <p><input type="checkbox"/>2.好一些</p> <p><input type="checkbox"/>3.跟目前一樣</p> <p><input type="checkbox"/>4.差一些</p> <p><input type="checkbox"/>5.差很多</p>	<p>差很多 2</p> <p>差一些 1</p> <p>跟目前一樣 0</p> <p>好一些-1</p> <p>好很多-2</p>
	<p>您覺得未來幾年後，自己家庭的經濟情況會變得怎麼樣?</p>	<p><input type="checkbox"/>1.好很多</p> <p><input type="checkbox"/>2.好一些</p> <p><input type="checkbox"/>3.跟目前一樣</p> <p><input type="checkbox"/>4.差一些</p> <p><input type="checkbox"/>5.差很多</p>	<p>差很多 2</p> <p>差一些 1</p> <p>跟目前一樣 0</p> <p>好一些-1</p> <p>好很多-2</p>
	<p>請問您會不會擔心未來一年內失去主要的收入來源?</p>	<p><input type="checkbox"/>1.不擔心</p> <p><input type="checkbox"/>2.有點擔心</p> <p><input type="checkbox"/>3.相當擔心</p> <p><input type="checkbox"/>4.非常擔心</p>	<p>非常擔心 2</p> <p>相當擔心 1</p> <p>有點擔心-1</p> <p>不擔心-2</p>
傳統文化	<p>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p>	<p><input type="checkbox"/>1. 非常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2. 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3. 不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4. 非常不同意</p>	<p>無重編</p>
	<p>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p>	<p><input type="checkbox"/>1. 非常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2. 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3. 不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4. 非常不同意</p>	<p>無重編</p>
	<p>婆媳間有爭執，即使婆婆不對，做丈夫的也應該勸妻子聽婆婆的話。</p>	<p><input type="checkbox"/>1. 非常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2. 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3. 不同意</p> <p><input type="checkbox"/>4. 非常不同意</p>	<p>無重編</p>

	作學生的不應該質疑老師的權威。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非常不同意	 無重編
	如果只要一個孩子，生兒子比生女生好。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非常不同意	無重編
中國因素	一般來說，您認為中國(大陸)對我們臺灣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正面 <input type="checkbox"/> 2. 正面 <input type="checkbox"/> 3. 有點正面 <input type="checkbox"/> 4. 有點負面 <input type="checkbox"/> 5. 負面 <input type="checkbox"/> 6. 非常負面	無重編

附錄三



題目		選項	編碼
人口變項	受訪者的性別是	<input type="checkbox"/> 1.男 <input type="checkbox"/> 2.女	以訪員自填題為準，敗選編為 1，勝選編為 0
	請問您出生於民國：	<input type="checkbox"/> (1)前_____年 <input type="checkbox"/> (2)後_____年	換算為西元年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1.不識字 2.識字但未入學 3.小學 4.國（初）中初職 5.士校警校 6.高中高職 7.師範學校 8.專科 9.軍警專校 10.軍警官校 11.大學 12.研究所	「小學」及以下重編為 1 「國（初）中初職」重編為 2 「士校警校」與「高中高職」重編為 3 「師範學校」「專科」「軍警專校」「軍警官校」「大學」重編為 4 「研究所」重編為 5
九合一選舉 輸家效果	第五波： 訪問日期	年/月/日	以 2018/11/24 為分以前為 0，以後為 1